

山巔上的雄鹿、猛虎與野山羊： 馬家塬馬車草原裝飾的來源與傳播途徑

吳曉筠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雄鹿、猛虎與野山羊是阿爾泰地區鐵器時代文化活力的來源，與當地自然生態、人口生計及文化表現密切相關，至今依然未變。這三種主題做為戰國晚期甘肅天水張家川馬家塬遺址馬車的主要動物裝飾，不僅是西戎與草原文化廣泛交流的結果，且應有更加深刻的背景。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過去幾種馬家塬遺址所見草原因素來源的說法進行再驗證。除論證馬家塬遺址與阿爾泰巴澤雷克文化的承襲關係外，本文更通過蒙古鹿石以及鄂爾多斯地區出土文物的對比，提出巴澤雷克文化因素是順著阿爾泰山南麓經過蒙古、鄂爾多斯再向南進入馬家塬。通過這些地區出土文物的綜合對比，本文試圖呈現巴澤雷克文化因素傳遞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形式，以及這些文化因素如何為馬家塬貴族所採用並重新詮釋。

關鍵詞：草原動物紋飾、馬家塬、阿爾泰、歐亞草原文化交流、鐵器時代

一、前言

二〇〇六年開始，甘肅天水附近張家川馬家塬的山崗上，一連串的發現為戰國時期華夏邊緣的文化面貌帶來新的認識。遺址所在的隴山西麓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重要，可通過汧隴古道向東連結關中、向西連結甘肅西部，或可視為關中地區通向河西走廊的一個前哨。

甘肅張家川馬家塬遺址是一處戰國時期的貴族墓地，當墓室打開時，墓主人身上耀眼奪目的大量金飾，墓道中華麗細緻的馬車裝飾，均讓人驚異。¹ 墓地的年代定在戰國晚期至末期、秦初，約當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墓主為領土與秦國西部相接的西戎。²

墓中出土的文物風格鮮明，讓人在第一眼便能清楚辨識其混合式的文化淵源，突顯出馬家塬墓地的文化混合特徵。在墓葬形式上，階梯式豎穴墓、階梯式偏洞室墓代表了本地戎人的習俗，隨葬陶器中的雙耳罐、鏟足鬲、陶鼎等等，也是本地戎人文化的代表。銅器則富有秦文化的面貌，例如 M3 出土的帶鋪首瓦稜紋繭形壺。更廣泛的中原文化影響則表現在與中原地區形制相同的銅禮器（如鼎、敦、甗）、銅戈、漆繪馬車及車馬器（如車轆、車傘蓋弓）。來自歐亞草原文化的證據則強烈表現在墓主人隨身的金銀項飾、金腰帶飾、銀鞋底，以及馬車上的草原動物及圖案化鏤空飾片。（圖 2、3）總體來說，墓中器物的文化因素來源於本地、歐亞草原、東鄰的秦國，以及通過秦國而來的中原地區器物。³ 這些不同文化的產物或文化因素匯聚於此，共同構築墓主人獨特的墓葬特徵。因此，馬家塬墓地不但表現了華夏邊緣的面貌，更代表了更遠的歐亞草原文化與華夏文化的銜接。

1 考古發掘報告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 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 9 期，頁 4-28；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10 期，頁 25-51；〈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8～2009 年發掘簡報〉，《文物》，2010 年 10 期，頁 4-26；〈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10～2011 年發掘簡報〉，《文物》，2012 年 8 期，頁 4-26。

2 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文物》，2009 年 10 期，頁 70-77。關於西戎的定義及相關討論，參見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先秦兩漢考古學歸屬問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80-192；趙化成，〈甘肅東部與羌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145-176。

3 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頁 70-77；黃維、陳建立、王輝、吳小紅，《馬家塬墓地金屬製品技術研究：兼論戰國時期西北地區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北方先秦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 215-222；米玉梅、趙吳成，〈從馬家塬戰國墓管窺上古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魯東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6 期（2015），頁 88-91。

馬家塬墓地雖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徵，但由個別器物觀之，又極少出現混合的式樣。高級貴族墓葬中的馬車，更是風格互不相容的最佳例證。王輝由目前已發現的四十餘輛馬車分析，將之分為四類：（一）以金、銀及珠飾裝飾的豪華馬車；（二）以銅或錫裝飾的髹漆或不髹漆車輛；（三）髹漆車輛；（四）無裝飾的木車。⁴ 這些木車車廂形式雖有變化，如有珥、無珥，或圓形、方形等，但木車結構基本與中原地區的獨輦馬車沒有太大區別。部分馬車更設有傘蓋，傘架結構、傘柄裝飾以及末端所附的蓋弓帽，也均來自於中原地區的傳統，與秦始皇陵一號銅車馬相近。⁵ 趙吳成對馬家塬所見馬車進行了細緻的復原，並據功能分為戰車、安車及役車等幾類。⁶ 除馬車結構外，馬家塬馬車最顯著的中原特徵是木車的髹漆表面以及具有功能性的車器。中原馬車自商代以來即有髹漆的傳統。由保存較好的幾處馬車看，山西北趙西周晉侯墓地一號車馬坑馬車彩漆有紅、黑、石綠三色。⁷ 湖北隨縣郭家廟兩周之際曾國墓地的馬車則是以黑、紅兩色為主。⁸ 戰國時期楚國墓葬漆木器保存良好，也因此經常見到髹黑紅漆的木車構件。⁹ 馬家塬馬車彩漆也以黑紅為主，少數間以石綠、石青及白彩，均是中原地區馬車固有的色調。¹⁰ 1號墓3號車的車廂側板上更有近似於同時期楚帛書「十二月令」圖上的神人肖像。¹¹（圖 1-c）特別具有標誌性的是，馬家塬馬車車軸末端多裝配有不見於草原地區的典型中原式車書及車轄。在馬家塬遺址近乎完全遵照中原樣式打造的木車上，卻在車體表面裝飾大量不見於中原地區、富含草原風格的金、銀、銅、鐵飾件。其中又以具有鮮明草原特

-
- 4 王輝，〈馬家塬戰國墓地綜述〉，《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8-21。
 - 5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6 趙吳成，〈甘肅馬家塬戰國墓馬車的復原——兼談族屬問題〉，《文物》，2010年6期，頁 75-83；〈甘肅馬家塬戰國墓馬車的復原（續一）〉，《文物》，2010年11期，頁 84-96。
 - 7 國家文物局編，〈北趙晉侯墓地一號車馬坑〉，《2006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66-67。
 - 8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彩版 3-5。
 - 9 漆木車構件多發現於楚文化高級貴族墓葬中，如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所見（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1期，頁 89-90、105、107）。
 - 10 趙吳成，〈甘肅馬家塬戰國墓馬車的復原（續一）〉，頁 84-96；〈戰國戎人造車〉，《故宮文物月刊》，398期，2016年5月，頁 38-50。
 - 11 馬家塬漆繪神人圖像見王輝，〈發現西戎——張家川馬家塬墓地〉，《中國文化遺產》，2006年7期，頁 69；戰國楚帛書「十二月令」圖，見 Noel Barnard, *The Chu Silk Manuscrip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tudies 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art 2, Monograph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5*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3), 236-243.

徵的鏤空花葉紋飾片及動物形飾片，包括帶有大長角的野山羊（ibex，除野山羊，也稱為北山羊、羴羊）、虎、鹿與狼等草原動物造型，最為突出。（圖2）這些非中原、已被許多學者認定屬於草原式的裝飾，以非常精密的方式裝置在木車的表面。草原式飾片與中原式木車彩漆風格涇渭分明，像是秦國或其他中原地區所造木車被西戎以草原風格的金、銀、銅飾片重新裝飾成不同於中原地區的面貌。

這些飾片是本地所造？由其他地方輸入？或受到何處的文化影響？是瞭解馬家塬馬車草原文化因素來源的重要議題，也對瞭解馬家塬墓主的文化淵源、文化接觸，以及戰國時期的西向交通網絡有重要意義。

二、西元前四至三世紀歐亞草原東部地區鐵器時代文化 與馬家塬遺址：文獻回顧

馬家塬動物紋飾的鮮明草原特徵，使探討此一問題的大部分學者將目光鎖定在歐亞草原地區。對馬家塬遺址所見歐亞草原因素的解釋性說法則主要聯繫於幾種通泛性的中亞草原文化、地理或詞彙，例如，斯基泰（Scythian）、塞種（Saka）、薩彥—阿爾泰（Sayan-Altai）、巴澤雷克（Pazyryk）、南西伯利亞（Southern Siberia）、鄂爾多斯、北方草原文化等等。討論的基礎則是根植於馬家塬遺址發掘之前，長期建構起的中原及北方地區與歐亞草原文化互動的框架。¹²

馬家塬遺址發現後，已有學者對該遺址馬車上的草原式裝飾提出文化來源的解釋。多數學者雖指向歐亞草原東部，特別是阿爾泰、天山地區，但對馬家塬所承繼的文化淵源有不同的認識。例如，王輝提出馬家塬墓地所具有的歐亞草原因素包括歐亞草原東部的中國北方系青銅文化，以及歐亞草原中、西部的斯基泰文化、塞種文化及巴澤雷克文化等多種文化因素。¹³ 動物紋飾與阿爾泰著名的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巴澤雷克遺址有關，文化歸屬於「斯基泰動物紋」，¹⁴ 而長角野山羊形車飾、鏤空

12 這一議題自一九二〇年代以來一直廣受學者關注，一九二九年 M. I. Rostovtzeff 即已發表中國所見之草原動物裝飾的專著 *Le Centre de L'Asie, La Russie, La Chine et Le Style Animal*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29)。其後重要者如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耶特馬爾 (Karl Jettmar)、梅原末治、Jaroslav Prusek、Emma C. Bunker、Jessica Rawson、John H. Haskins、蘇芳淑 (Jenny F. So)、林沄、田廣金、郭素新、烏恩岳斯圖、杜正勝、羅豐、李零，及近年的楊建華、包曙光、郭物、馬健、代威歲等等。

13 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頁 72-74。

14 王輝，〈馬家塬戰國墓地綜述〉，頁 28。

花形車飾則屬於北方青銅文化因素。¹⁵ 黃維等對馬家塬金屬器所進行的分析研究認為，馬家塬所見金銀器物廣受歐亞草原文化影響。鍍金銀鐵器與時代更早的土瓦阿爾贊 (Arzhan) 2 號塚出土的金銀裝飾鐵器有文化及技術聯繫。¹⁶ 楊建華認為馬家塬所見之草原特徵「與中國北方的固原和鄂爾多斯等地的青銅器有很大區別」，並將之與哈薩克斯坦東部天山北麓包括依塞克 (Issyk) 塚在內的七河地區 (Severn river region) 的動物紋飾進行比較，認為是來自這一區域。¹⁷ 羅森 (Jessica Rawson) 提出馬家塬的馬家塬鐵矛上的枝岔紋可與阿爾贊 2 號塚出土的鹿角飾對應，而 S 形捲曲的草葉紋更可溯及希臘。¹⁸ Raphael Wong 對馬家塬及巴澤雷克遺址的發現進行對比，指出剪影式動物、鏤空飾片等特徵與巴澤雷克的許多裝飾相近。而馬車上以列隊動物環繞格狀拼接飾片的作法，更與西亞的裝飾風格息息相關。¹⁹

在上述的討論中，南西伯利亞、薩彥—阿爾泰及這一區域西南方的天山北麓七河地區格外受到重視。主要在今日俄羅斯南西伯利亞、土瓦、蒙古共和國西部、哈薩克斯坦東部、新疆、蒙古的交會地帶。西薩彥土瓦地區因西元前八至六世紀的阿爾贊 1、2 號塚出土大量草原黃金製品，成為金銀工藝的重要對比參考。²⁰ 這兩座墓葬一般被認定為早期斯基泰鐵器文化。墓葬中均有大量殉馬，1 號塚中發現超過四百匹馬，2 號塚的一個專門馬坑內埋有數十匹配有馬具的馬匹，顯示馬在祭儀及葬儀中具有重要地位。與馬家塬時代相當的巴澤雷克遺址得到更多的關注。墓葬中發現了戰國絲綢及銅鏡，使這一遺址成為阿爾泰與中原地區交流的重要例證。在發掘者魯金科 (Sergei I. Rudenko) 出版於一九五三的發掘報告中，便已清

15 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頁 72。

16 黃維、陳建立、王輝、吳小紅，《馬家塬墓地金屬製品技術研究：兼論戰國時期西北地區文化交流》，頁 264。

17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頁 215-219。

18 Jessica Rawson,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in *Stories That Interconnect the Past: Notes from across Ancient Asia*, eds. Kathryn Linduff and Karen Rub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2018) (forthcoming).

19 Raphael Wong 的研究未見發表，本文均轉引自 Jessica Rawson,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20 阿爾贊 1 號塚資料見 M. Grjaznov, *Der Materialien Arz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aterialien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23 (Munich: C. H. Beck, 1984)。二號塚由俄國及德國考古聯合隊於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四年進行發掘，資料見 K. Cugunov, H. Parzinger, A. Nagler, "Der skythische Fürstengrabhügel von Arzan 2 in Tuva. Vorbericht der russisch-deutschen Ausgrabungen 2000-2002," *Eurasia Antiqua* 9 (2003): 113-162; *Der Goldschatz von Arzan. Ein Fürstengrab der Skythenzeit in der südsibirischen Steppe* (Munich: Schirmer/Mosel, 2006)。

楚瞭解這一議題的重要性。²¹ 近年馬健對薩彥—阿爾泰與中原及北方地區的研究，為進一步認識馬家塬遺址的時空框架及文化內涵提供了更完備的基礎。²² 其〈公元前八至三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一文，梳理了一九四〇年代以來俄國學者對阿爾泰及土瓦西薩彥地區考古學文化逐步認識的過程，以及現今所採行的文化框架，為進行馬家塬，乃至中國北方及中原地區與該區域之間的文化關係，提供了有益的時空框架。該文並論述了薩彥—阿爾泰地區的幾種主要域外文化因素來源，包括鄰近的塞種文化，以及更遠的波斯、希臘及中國等。另也就該地文化對中國北方及秦文化的影響做了討論。²³ 通過許多學者的研究，現在對包括薩彥—阿爾泰地區在內的歐亞草原東部文化面貌已有了更細緻的分類。對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由耶特馬爾（Karl Jettmar）等學者所提出的「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Scytho-Siberian animal style）」及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西伯利亞」族群，已可進行更細微、反映區域差異的辨識。²⁴

綜合目前的認識，西元前四至三世紀與馬家塬遺址時代相當的歐亞草原，由高加索地區往東至阿爾泰地區，主要包括了斯基泰、薩爾馬泰（Sarmatian）、塞種、巴澤雷克及米努新斯克（Minusinsk）盆地的塔加爾（Targar）等文化。²⁵（年表如附表）斯基泰文化因素，特別是使用金器、動物紋及大量馬器等等，在整個歐亞草原都廣泛存在，具有深遠影響。埃及、希臘、波斯文化因素也藉著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向東傳布。到了西元前四世紀時，斯基泰文化的分佈範圍主要侷限於烏拉爾山（Urals）以西，黑海、裏海附近的歐亞草原西部。與斯基泰文化關係密切的塞種文化則主要盤據在天山一帶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草原地帶，及新疆中部地區。塞

21 巴澤雷克墓葬的發掘始於一九二九年，俄文發掘報告出版於一九五三年，英譯本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出版於一九七〇年。他的研究在一九五〇年代即介紹到中國，一九五七年在《考古學報》上刊登〈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年2期，頁37-48、108-111）。

22 馬健，〈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3期，頁50-64；〈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歐亞學刊》，第8輯（2006），頁38-84。

23 馬健，〈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頁38-84。

24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New York: Greystone, 1967).

25 馬健，〈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頁38；Joan Aruz etc. eds.,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43; 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9; 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22。

種文化東北方的阿爾泰區域，則是以巴澤雷克文化為主。這些地區多元的草原文化彼此之間互相交流影響，因此在文化面貌上有重合之處。但不同文化背後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族源及觀念，故而不論是將馬家塬馬車上所見的草原飾件認為是源自斯基泰文化、塞種文化或巴澤雷克文化，均代表著不同的文化淵源、人群及歐亞草原與馬家塬聯繫接觸的路徑。如許多學者已例示的，西元前三千年前出現在兩河流域的帶翼獅或鷹首獅身造形的格理芬（griffin）不但以獅格理芬及鷹格理芬的形象普遍存在於歐亞草原，更在阿爾泰地區進一步結合當地的鹿崇拜，轉化為獨特的鷹首鹿角鹿身的鹿形格理芬。²⁶

如前文所述，現已有不少學者對馬家塬所見草原因素進行文化淵源的判斷，但多依過去已建立的文化交流通道及說法認定可能的文化來源，尚未全面、就材料細節以及馬家塬遺址的獨特性進行比較研究。因此，以下就學者已提出的馬家塬動物飾件及金銀器的兩大可能文化來源，即哈薩克斯坦七河地區所代表的塞種文化以及巴澤雷克遺址所代表的巴澤雷克文化，進行動物造形表現性及馬具的比較討論。

三、天山北麓七河地區的塞種文化與馬家塬遺址草原因素的對比

塞種的名稱最早來自於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大流士一世（Darius I, r. 522-486 BCE）的文獻。在中文史料中，則遲至《漢書·西域傳》才有關於「塞王」的記載。關於這一族群的來源，或認為是斯基泰的一支，或認為是中亞草原本地的民族等等，說法頗多，尚無定論。²⁷ 考古學上的塞種文化，則有較為明確的認定。其主要的分佈範圍在今日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中亞草原地帶、阿爾泰山西南麓齋桑泊（Zaisan Lake）附近，東達新疆中部地區。中心地區在

26 本文「鹿形格理芬」的稱法，主要沿用李零、馬建的觀點。見李零，〈論中國的有翼神獸〉，《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25-126；馬健，〈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頁66；〈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頁54-60。相關討論另見Franz Hančar, "The Eurasian animal style and the Altai complex," *Artibus Asiae* 15.1/2 (1952): 182-190; Anne Roes, "Achaemenid influence upon Egyptian and nomad art," *Artibus Asiae* 15.1/2 (1952): 17-30; Guitty Azarpa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 *Artibus Asiae* 22.4 (1959): 313-339; Diana Patch, *Dawn of Egyptian Ar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2), 139-140。

27 關於塞種歷史的討論，見余泰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Leonid T. Yablonsky, "Written source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the Sakai n Central Asia," i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ry: Zinat Press, 1995), 190-199；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鉤沈〉，《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頁154-166。

謝米列契 (Semirechye) 與天山北麓的伊犁河上游地區，時代集中於西元前五至三世紀。²⁸

總體看來，塞種文化除具有歐亞草原共通的西伯利亞動物風格藝術外，在許多方面也深受波斯文化的影響。²⁹ 其物質文化最具特色的金屬器為邊緣立有成排動物的鏤空圈足盤、馬鐙形銅銜、長條形銅鑷、銅劍等，動物造形牌飾為富有寫實性的風格化立體意象。另外，受到西邊波斯的影響，也多見鏤空鈴鐺。³⁰ (圖 4)

塞種文化內容最豐富的遺址集中在哈薩克斯坦境內天山山脈北麓伊犁河流域的七河地區。其中又以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發掘位於依塞克山間河谷的依塞克塚 (Issyk mound) 最為重要。³¹ 目前該遺址的時代被定為西元前五到四世紀或西元前三至二世紀，與馬家塬遺址的時代大致相當。³² 因墓內出土大量金器而被稱為「金人墓」或「金武士墓」，許多學者也將此墓葬豐富的金器與馬家塬金器進行對比。楊建華更進一步認為馬家塬的金器文化即源於此處。將依塞克塚與馬家塬金器進行對比可以發現許多共通之處。大量使用金器，以金、銀製作長角野山羊、猛虎等動物形飾片，以及圖案化的鏤空飾片等，均與馬家塬所見車飾相似。這些相似性除了反映兩處遺址共同的草原文化背景外，更是該時間段歐亞草原「斯基泰—西伯利亞」族群共通的藝術主題。³³

若將依塞克塚中所見金器及動物紋飾形態與馬家塬所見相類文物進行仔細對比，也可發現兩處遺址使用的紋飾母題雖近，多以草原動物及鏤雕為主，但在細節表現上仍有極明顯的差異。首先，在金器工藝的表現上，雖然都有圖案化的鏤空飾片，馬家塬的飾片主要是順著構圖線條加上細線或谷折線以增加立體感，而依塞克鏤空飾片則是以連續的橫向波浪表現金片的體量感。(圖 5-a、b、g、h) 動物肢體

28 關於塞種文化的考古綜述，見 Leonid T. Yablonsky,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i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ry: Zinat Press, 1995), 200-249。

29 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107-126.

30 Leonid T. Yablonsky,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200-249, figs. 5, 11, 43.h, 59, 65-67, 100。

31 K. A. Akishev, *Issyk Mound: The Art of Saka in Kazakhstan* (Moscow: Iskusstov, 1978).

32 伊塞克塚的時代目前有兩種看法，傳統認為是西元前五到四世紀，如 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在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中即採這種傳統觀點。近年 Claudia Chang 與 Katharine S. Guroff 在 *Of Gold and Grass: Nomads of Kazakhstan*, (Maryland: FIAE/Mosaic, 2006) 則將之定在西元前三至二世紀，此說為楊建華所採用。

33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頁 215-219。

的表現上，馬家塬的動物飾片是以平行的谷折線或細線表現肌理，有時再加上凸點紋以表現細節，形態較為樸拙。依塞克動物飾片的肌理表現則圓弧流暢，富有寫實性及生命力。（圖 5-c、d、i、j）第二，在長角野山羊的造形表現上，依塞克塚所見羊型飾具有生動寫實的造形，多抬頭挺胸，或四足併攏躍起，馬家塬所見則是以剪影的形式表現四足分立的低頭昂角狀。（圖 5-d、j）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部分依塞克塚出土的立體羊形飾強調了羽翼的造形（圖 4-b），這種具有波斯風格的表現也不見於馬家塬遺址。第三，老虎的造形差異也相當顯著。馬家塬的虎形飾面朝前，姿態表現溫和，依塞克塚的老虎則是身體扭轉成 S 形的回首猛虎，整體富有動感及攻擊性。（圖 5-c、i）第四，依塞克金器上有個別動物後肢 180 度翻轉的造形，在馬家塬遺址僅見於極少的帶飾上，動物的表現風格也不同。（圖 5-f、1）第五，虎與羊搭配的構圖方式也有很大差異。馬家塬 3 號墓 1 號車車廂側板上長角野山羊與虎形飾件以兩兩相同為一組，以倒影的方式排列，虎與羊之間沒有表現出互動關係。³⁴ 在 16 號墓 1 號車的側廂板上，虎與羊依序排列，如同行進中的隊伍，氣氛表現平和。³⁵ 依塞克塚墓主人的帽子上，回首的猛虎均對鄰近的羊做出攻擊狀，老虎旁邊的山形飾則表現著山巔上的場景。猛虎、長角野山羊及山形飾互相搭配，構成山巔上猛虎騰空攻擊跳躍的長角野山羊的連續主題，極具草原猛獸的活力。（圖 5-e、k）³⁶ 將兩處遺址的虎、羊飾進行比較，馬家塬馬車側廂板及車輪上的羊、虎形飾片與圖案化花紋飾片互相搭配，構成的是整齊有規律，具有秩序感的圖案化排列，與依塞克塚墓主帽飾的凶猛、富有動態感的裝飾不論在動物表現、追求的主題內容及氣氛上，均有顯著差異，在文化表現上截然不同。

馬器，特別是馬銜與馬鑣，在歐亞草原文化出土數量多，形式變化快速、多元，是判定年代及文化屬性的重要標準。塞種文化與馬家塬馬銜的形式，也有明顯差異。塞種文化的馬銜多為銅製，兩外端以馬鐙形環為主，而中間兩銜相接處則是紮實的圓環。馬鑣則多呈 C 棍形，以素面或簡單裝飾為主。³⁷（圖 4-c）馬家塬所見馬銜多鐵製，形式上較塞種文化馬銜簡單，僅似以一鐵條將兩端彎折成單純的

34 考古發掘報告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 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頁 13。

35 趙吳成，〈甘肅馬家原戰國墓馬車的復原（續一）〉，頁 86。

36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頁 217，圖二-2。

37 Leonid T. Yablonsky,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204, 220.

環形，外側銜環較大，中間銜接環呈水滴形。馬鏢也有鐵製，以 S 形為主。³⁸（圖 8-a）

以上所述紋飾及馬具的差異性，說明了馬家塬遺址馬車與塞種文化不論在藝術表現概念及御馬器上均有相當差異。七河地區的塞種文化與馬家塬的連結性不高，應不是馬家塬草原因素的來源。

四、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文化與馬家塬遺址馬車裝飾

巴澤雷克文化是以一九二九年發現於阿爾泰山中南部巴澤雷克谷地的墓群命名。³⁹ 在年代上，一般認為約在西元前五到四世紀，但也有學者據 2 號塚的發現認為是西元前三〇〇至二五〇年。⁴⁰ 這一遺址發掘早，內涵豐富，發掘報告內容完整，且在一九七〇年便已翻譯成英文，故成為阿爾泰地區最廣為人知，最常為學者引用為歐亞草原鐵器時代及草原藝術的例證。該墓地經一九二九、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中的五次發掘，清理了七座大型積石塚。這些墓塚內隨葬品豐富，包括了大量金屬器、織品、皮毛製品及木器，充滿歐亞草原多元交融的文化色彩。5 號塚內更隨葬了一輛完整的四輪車。已有許多學者進行分析，說明了巴澤雷克墓塚中來自希臘、波斯、斯基泰、塞種及中原地區的物品及藝術風格。⁴¹ 本地特色則表現在馬具上，馬具多裝配於隨葬的馬匹身上，最突出的是圖像豐富的馬鞍及華麗的成套貼金箔木製馬絡具，以及將馬首裝飾成誇張的大鹿角獸。（圖 6-a）

除巴澤雷克墓群，巴澤雷克文化還包括了鄰近密集分佈的許多積石塚墓地，不

38 考古發掘報告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 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頁 26-2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208-209。

39 發掘報告見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70)。

40 J. P. Mallory, "The date of Pazyryk," in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199-211; I. Hajdas, G. Bonani, I. Slusarenko, and M. Seifert, "Chronology of Pazyryk 2 and Ulandryk 4 kurgans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radiocarbon dating and dendrochronology—a step towards more precise dating of Scythian burials," in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in Eurasia*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2004), 107-116.

41 Judith Lerner, "Some so-called Achaemenid objects from Pazyryk," *Source, Not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10.4 (1991): 8-15; 馬健，〈公元前 8- 前 3 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頁 62-70；Xin Wu, "Persian and central Asian elements in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the early nomads at Pazyryk, Southern Siberia," in *Social Orders and Social Landscapes* (New 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379-392.

論在墓葬形制或出土物上，均與巴澤雷克墓群具有強烈的共性。其中，西元前四世紀晚期至三世紀早期的波來爾（Berel）遺址年代比巴澤雷克墓群稍晚或同時、與馬家塬遺址相近，資料發表豐富，尤為重要。這一遺址位於今日哈薩克斯坦東部阿爾泰山南麓高山河谷內。早在一八六五年，Wilhelm Radloff 便已對一座被盜掘的大型積石塚進行清理，出土了配有馬具的馬匹及織品。⁴² 大規模的科學發掘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才由法國、義大利、哈薩克斯坦三國聯合考古隊再度展開，發掘工作持續至今。⁴³ 在目前的發現中，10、11 及 36 號大型積石塚格外引人注目。與巴澤雷克墓群一樣，這些積石塚均以石塊在地表分層堆疊成巨大的圓形墓塚。地表石塚中心位置的下方是一方形土坑，內有墓主人的巨大木槨。波來爾遺址大型墓葬的墓室多分成兩個部分，一半放置墓主的內槨，另一半則是排列有序的臥馬，馬匹身上裝配著華麗馬飾。（圖 7）

波來爾大型積石塚的發現，除了增加巴澤雷克文化的豐富性外，大量的出土品也提供與馬家塬墓地馬車裝飾及其他具有草原風格物件絕佳的對比例證。以下以巴澤雷克及波來爾兩處墓地為中心，與馬家塬遺址馬車裝飾進行對比，就幾項突出的裝飾表現，討論巴澤雷克文化與馬家塬遺址間的相關性。

（一）馬具：裝飾及工藝

馬具在巴澤雷克及波來爾兩處墓地具有顯著的共同特徵，主要包括了由皮及毛織品製作的馬鞍飾、華麗的木製貼金箔馬絡具及馬飾。

巴澤雷克 2 號塚的馬鞍上以剪貼表現的虎噬盤羊裝飾，兩個相同的大幅圖案分別填滿馬鞍的左右兩側。（圖 6-b）5 號塚的馬鞍以變形植物紋為主，馬鞍邊緣上懸掛著後肢舉翹的大角麋鹿。（圖 6-c）波來爾 10 號塚馬匹均配有馬鞍，其上裝飾帶

42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xxxiii; Zainolla S. Samashev, "The Berel kurgans: Som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in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31.

43 波來爾遺址一九九八年以後的發掘報告見 З. С. Самашев, Г. Базарбаева, Г. Джумабекова, С. Сунгатай, *Berel-Berel*. Альбом, Алматы, 2000; З. С. Самашев, К. Ш. Фаизов, Г. А. Базарбаев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и полевочвы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Алматы: ОФ «Берел», 2001); З. С. Самашев, В. П. Мильников, *Деревообработка у древних скотовод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деревян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 из кургана II могильника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ОФ «Берел», 2004); A. Gorbunov, Z. Samashev, and E. Severskii, *The Treasures of Frozen Burial Mounds of the Kazakh Altai: Materials of the Berel Burial Site* (Alma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 Kh. Margul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05); А. П. Горбунов, З. С. Самашев, Э. В. Северский, *Сокровища мерзлых курган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ТОО Иль-Тех-Кітап, 2005); З. С. Самашев,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аймас», 2011).

翼長角野山羊及鷹首獸。(圖 7-c) 兩處遺址的馬絡具均以木質為主。巴澤雷克 1 號塚的馬絡頭以木、皮、毛製成，將馬匹裝飾成鹿的樣貌。考究的細節除表現在具像的鹿角外，也刻意做出鹿耳。與之相搭配的馬絡具則以華麗的貼金木雕構件組成，創造出華麗的草原視覺感。(圖 6-a) 在波來爾 10 號塚隨葬的十匹馬中，領首的馬匹頭頂著包金木雕細長大羊角裝飾，使之轉化為長角野山羊的形象。(圖 7-b、e) 類似的大羊角貼金木馬絡飾也見於時代更早、西元前六到五世紀的巴沙阿德 (Bashadar) 遺址。(圖 12-a)

馬家塬墓地未見馬鞍，馬匹主要為駕車所用。但馬具上仍表現出與巴澤雷克文化相近之處。首先，馬家塬的鐵製馬鑣與巴澤雷克及波來爾的木製馬鑣均呈 S 形。巴澤雷克文化的 S 形馬鑣兩末端多飾以對稱的抽象植物紋及動物紋（主題包括具有波斯風格的獅子、草原特色的鷹鳥、盤羊 (argali) 等等)。(圖 6-e) 在眾多例子中，波來爾 36 號塚與馬家塬 M1 的銜鑣組合具有很高的可比性。波來爾與馬家塬鐵銜幾乎一致，外圈為圓形，銜接環為水滴形。S 形馬鑣兩端的鷹鳥飾也可相互呼應。(圖 8)

波來爾木鑣表面還留有殘存的金箔。木器表面貼金的作法廣見於巴澤雷克文化，其所呈現的效果與馬家塬鐵鑣兩端的鍍金銀有共通之處。(圖 6-d) 巴澤雷克文化中雖未見鍍金銀鐵器，但時代更早的西薩彥地區西元前七世紀阿爾贊 2 號塚出土的鐵兵器上，即有與馬家塬鐵器十分接近的金銀工藝。在一件鐵斧上，許多小片金箔極細緻地拼貼出捲雲紋。⁴⁴ 鐵鑣上以金銀互相搭配表現，則與前述馬家塬鍍金銀鐵鑣的構圖方式更為接近。⁴⁵ (圖 9) 或許有可能西薩彥地區公元前七世紀鐵兵器表面金銀構圖的方式影響了之後西邊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文化木製馬器器表貼金的作法。綜合兩者的裝飾工藝概念，在強調車駕而非騎馬的馬家塬墓地中，鍍金銀鐵器除前述馬鑣外，也大量應用在鐵製車器上。⁴⁶ (圖 10) 如 14 號墓 1 號車，木質的車構件，如車軛、車衡、車軸及車輿，表面大面積飾以鍍金銀鐵飾件。⁴⁷ (圖 10-a) 這樣的裝飾方式也運用於如 M1 所見的中原式車車上。⁴⁸ (圖 10-b) 馬家塬

44 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26.

45 Е. Ф. Королькова, *Властители Стен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2006), 17.

46 馬家塬墓地貼金銀箔鐵器製作工藝的科學研究，見黃維、陳建立、王輝、吳小紅，《馬家塬墓地金屬製品技術研究：兼論戰國時期西北地區文化交流》，頁 244-264。

47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172-209。

4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200-201。

鐵車器上的鍍金銀工藝不見於中原地區的銅車器，這些鍍金銀鐵車器應是本地工匠結合中原的車器形式與薩彥—阿爾泰地區的金銀工藝所創造出來的地方特色。

（二）動物圖式：山羊、猛虎與雄鹿

馬家塬馬車裝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車廂板上的動物裝飾圖案。這些動物圖像以剪影式的長角野山羊及老虎所佔比例最高，另有狼、雄鹿及魚等主題。這些動物飾片多與變形草葉紋飾片搭配，構成排列有序或具對稱性的圖案，動物逐一排列，彼此之間沒有明確的互動關係，顯示其做為單純裝飾圖案的傾向。（圖 1-f~h）除裝飾於馬車，動物飾片也發現於墓主人身邊，或許是做為棺飾使用。⁴⁹

不同墓葬內的馬車雖採用共通的裝飾主題，但不同材質所呈現的圖像，卻又有差異。例如同樣的剪影式長角野山羊，M1 的銅羊僅表現輪廓及眼睛，M3、M4、M7 的銀羊以凹凸的線條及凸點表現肌理、鬃毛等特徵，M16 的金羊則以凸點及鏤空的方式表現動物身上的細節。（圖 2-a~d）

已有許多學者論述剪影動物是巴澤雷克文化所特有的圖像特徵。⁵⁰ 在巴澤雷克遺址，如剪紙或鏤雕般的效果多見於服飾、馬鞍上的皮革裝飾。主題有大角麋鹿、公雞、老虎及格理芬等造形，動物的肌理多以鏤空方式表現。更加具有裝飾化效果的動物剪影鏤雕見於巴澤雷克西北的圖克塔（Tuekta）遺址，豐富細緻的漩渦線條賦予動物圖像更強烈的視覺感。⁵¹（圖 11）

阿爾泰地區遺址雖普遍採用共通的動物主題，但遺址間所強調的動物又略有不同。如前文所述，巴澤雷克遺址的裝飾動物以虎、大角麋鹿及盤羊為主，波來爾遺址更多的是與馬家塬十分接近的長角野山羊。在時代更早的圖克塔遺址，同類主題表現為老虎與鹿的結合；巴沙阿德遺址則有虎與多種動物搏鬥的場面。⁵²（圖 12-b）馬家塬馬車上的動物圖像顯然具有強烈的阿爾泰風格。除主要的虎與羊，其他流行於歐亞草原東部的動物主題，如盤羊、動物搏鬥等等，也偶見於馬家塬墓葬

49 如階梯式墓道豎穴偏洞室墓 M16 墓主左右側及斜坡墓道墓 M6 墓主人左側均有長角野山羊飾片。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14、15、23、58-59。

50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30-32, 72-73, 229-271; Franz Hančar, "The Eurasian animal style and the Altai complex," 182-190; Jessica Rawson,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51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270-271.

52 E. Ф. Королькова, *Властители Стеней*, 122-123.

墓主的腰帶飾件，如 M14、M15 的虎噬羊腰帶牌飾及 M15 的盤羊腰帶飾。⁵³（圖 3）

波來爾遺址長角野山羊的表現方式與馬家塬所見格外接近。這種長角野山羊的形象，廣見於歐亞草原東部的岩畫，應是當地習見的動物。波來爾 10 號塚領首馬匹裝飾的貼金木羊角飾件與馬家塬的長角野山羊羊角的造形一致，也與岩畫中對這種羊的描繪相近。10 號塚馬鞍上的剪影式帶翼長角野山羊（發掘者將之稱為斯芬克斯）及展翅鷹首獸各自繞圈排列，可與馬家塬墓地 M21 馬車車輪上長角野山羊繞圈排列的構圖互相呼應。⁵⁴（圖 1-h、7-c）剪影動物依序排隊的布置也見於貼在巴澤雷克 2 號塚陶瓶上的公雞裝飾。（圖 11-d）

將馬家塬的各種剪影式長角野山羊與波來爾所見相比，可以明顯感受到馬家塬工匠對前肢上方、大約肩頭位置的突出物感到困惑。如 M3 的長角野山羊，便有兩種型式，一種將之表現為羊頸上鬃毛的末端捲曲，一種則是順著上肢的肌理，直接突出既有的肢體框架。⁵⁵（圖 2-a、b）老虎的造形也有類似的現象。一般情況下，老虎仍維持本來的形態，但在以細線表現身體的細節時，也被加上了末端捲翹的鬃毛。（圖 2-e、f）其他動物（如狼、鹿）的表現上，則未顯示出這樣的困擾。（圖 2-e~h）若進一步考察現代阿爾泰長角野山羊，⁵⁶ 以及哈薩克斯坦、蒙古、鄂爾多斯等地區岩畫及寫實立體造形的圓雕表現，便可清楚看到這種羊不具有鬃毛。⁵⁷（圖 13）這樣的肩部突起或許原本是仿效如波來爾野山羊的翅膀造形，但最後因工匠不明就裡，便將之合理化為捲翹的鬃毛末端或莫名的上肢突出物。令人懷疑馬家塬工匠是否曾見過真正的長角野山羊。

53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頁 38-39、45。

54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10～2011 年發掘簡報〉，頁 18-19。

55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 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頁 19-21。

56 現代長角野山羊僅分佈於世界少數地區。其中，阿爾泰地區是重要的區域，在分類上被稱為 Siberian ibex，主要分佈在阿爾泰山及東邊的蒙古西部。再往東南的戈壁地區則有另外的專門品種。新疆西部地區也是長角野山羊的分佈地，在塞種藝術中也是重要的主題。以東的新疆中部地區及甘肅等地則不在分佈範圍內。

57 阿爾泰地區青銅時代岩畫、鹿石（Esther Jacobson-Tepfer, James E. Meacham, *Archaeology and Landscape in the Mongolian Altai: an Atlas* (Redlands, California: Esri Press, 2010), fig. 11.176)、哈薩克斯坦早期鐵器時代卡拉套（Karatau）遺址岩畫（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fig. 4-13）及鄂爾多斯多處遺址的羊形青銅飾件（鄂爾多斯博物館，〈鄂爾多斯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208、338-339）均可見到同類的寫實長角野山羊造形。

除羊斯芬克斯，馬家塬也可見到對格理芬造形的模仿。⁵⁸ 在一些墓主人的金腰帶上，反映了虎格理芬的樣貌。以馬家塬 M14、M15 的虎噬羊腰帶牌飾為例，老虎重視前肢上部肌肉的表現，與馬車上的老虎相當接近。⁵⁹ 將老虎格理芬化的作法則表現在虎頸部的鬃毛及尾巴末端各加上鷹首，一如巴澤雷克鹿格理芬的形成方式之一，便是將鹿角的枝岔末端各加上一個鷹首。(圖 3-a)

(三) 抽象的圖式：單元與組合

馬家塬遺址所見動物造形上的鏤空及裝飾，與阿爾泰地區習見的一些元素相呼應。羊、虎金飾片以兩個逗號形鏤空構成 S 形實線，表現出動物的肌理，與西元前六世紀圖克塔遺址鹿、虎上的鏤空方式十分接近。如圖 11 所示，類似的鏤空形式也多見於巴澤雷克遺址的剪影動物裝飾。

S 形鏤空更大量運用在描繪如植物紋樣般的車輿及車輪飾片上(圖 2-i、j)。飾片內由多個 S 形線條組合在一起，部分末端更分成弧形分岔，有時中間填以花朵，變化豐富，華麗異常。發掘者將之解釋為忍冬圖案。⁶⁰ (圖 2-i、1) 勾連的 S 形線條及花朵，都可在巴澤雷克文化中找到許多對照。例如，相似的花朵見於波來爾遺址的馬具、巴澤雷克遺址 4 號塚大掛毯上(圖 7-e、14-c)，勾連、分岔的 S 形鏤空圖式則見於 2 號塚的皮件及 2、3 號塚的馬鞍裝飾。⁶¹ (圖 15)

一些見於馬家塬遺址，卻不見或少見於中原地區的紋飾，在構圖上也可追溯到巴澤雷克遺址。馬家塬鍍金銀鐵車器上所見的捲草葉紋，是順著 S 形的線條，以或陰或陽的方式布列羽狀葉片。這樣的形態頗類似於巴澤雷克 3 號塚馬鞍上的圖式。另一類馬家塬遺址的矩尺金車飾片，整體或成矩尺形，或好幾個連續矩尺構成亞字形或 X 形，⁶² 與巴澤雷克 3 號塚墓主人帽子的帽頂及掛毯下擺形式相呼應。⁶³ 馬家塬 M3 馬車上金片條形飾上的心形紋，可在巴澤雷克 2 號塚的織品上看到對應。而 M3 銀箔條形飾上兩兩相對的 3 形鏤空，也對應著同類型的心形紋，只是圖形的主

58 鄂爾多斯地區動物格理芬化的相關討論見馬健，〈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頁 59-60。

59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2008 年發掘簡報〉，頁 38-39、45。

60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94-95。

61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fig. 72, pls. 153-154.

62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100、105、108。

63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pl. 155.

要部分被丟失了。⁶⁴ (圖 15)

在裝飾單元的組合上，如羅森及 Raphael Wong 已提出的，馬家塬馬車車廂板及車輪上整齊拼接裝飾片的作法，與巴澤雷克織毯上的花紋相近。⁶⁵ 在 1、2 號塚的拼接皮製壺套上，都可見到以菱格單元整齊排列的鏤雕花紋。2 號塚頭飾花紋以對稱的鏤雕曲線花紋菱格為單元，有序布列於帽子表面。⁶⁶ 馬家塬 M16 一件木杯上也有與車廂所見相近的鏤空裝飾片，依菱格單元的方式排列於器表。⁶⁷ (圖 16)

五、文化傳遞的途徑

草原文化因素如何向東南方的馬家塬傳遞，已有學者提出討論，主要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是通過蒙古。羅森近年的研究延續童恩正所提出的半月形地帶，更加細緻地討論了商周到戰國時期多元化的草原因素如何通過這一地帶進入中原地區。她指出馬家塬遺址對金、銀、鐵等兵器、珠飾及裝飾品與西薩彥地區更早的西元前七世紀阿爾贊墓葬所見相似，認為可體現一條草原文化由蒙古通過河西再進入中原的路線。⁶⁸ 王輝認為馬家塬貴族所採用的草原文化技術和觀念來自多方面，並據李零對有翼神獸傳播路線的推測，認為其中一條「從內蒙古中西部經寧夏、甘肅和陝西，進入四川雲南的路線是當時很重要的一條路線。」⁶⁹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是通過新疆而來，主要包括楊建華⁷⁰、米玉梅、趙吳成⁷¹等學者。楊建華依據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市南邊的阿拉溝墓地等遺址所見的動物形飾，指出一條天山通道，從「哈密地區經過河西走廊傳入天水地區」。⁷² 前文的資料分析表明，馬家塬馬車所見的草原文化裝飾主要的文化淵源是阿爾泰地區時代同時或稍早的巴澤雷克

64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 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頁 25；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pl. 150.

65 Jessica Rawson,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66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pls. 59, 65, 152.

67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8～2009 年發掘簡報〉，頁 23。

68 Jessica Rawson, "Steppe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le of hand-to-hand comb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33.1 (2015): 63;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69 李零，〈論中國的有翼神獸〉，頁 132-133；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頁 74。

70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頁 215-219。

71 米玉梅、趙吳成，〈從馬家塬戰國墓管窺上古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頁 91。

72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頁 220。

文化。其中又與巴澤雷克遺址及波來爾遺址最為密切。就地理位置看來，提出以上兩種路線的學者雖尚未就其中細節提出論證，但兩種說法似暗示了傳遞路線分別是從巴澤雷克文化東、西兩邊出發。

阿拉溝墓地雖發現戰國時期華夏織繡及漆器，但其動物造形金器，具有強烈的塞種文化特徵，包括動物造形具有立體感的浮雕紋路、凶猛的攻擊性及風格強烈的後肢翻轉，花朵造形均以浮雕表現，與馬家塬馬車裝飾平面化、線條簡單的作法不同。⁷³（圖 17）王炳華已指出阿拉溝墓地是塞種文化遺存，⁷⁴ 這與馬家塬馬車上所反映的阿爾泰巴澤雷克文化淵源，有不同的文化脈絡。

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文化對新疆、河西、鄂爾多斯及中國北方地區鐵器時代所存在的文化影響明顯，也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及肯定。但綜觀巴澤雷克文化因素在上述地區的出現，更多是作為廣泛斯基泰草原藝術東傳的中介角色，少有某一地區或遺址如馬家塬一般，呈現強烈巴澤雷克的原生特徵。因此，在這些區域追蹤巴澤雷克及馬家塬所共同具有的特徵，如剪影式金片動物、忍冬花紋、裝飾化的曲線等等，以及差異性，如金銀片上的細線、谷折線、小凸點等，或可為中間的傳遞過程，提供有益的證據或參考。

距離巴澤雷克文化中心區最近，又富有前述共同特徵者，阿爾泰山南麓與天山山脈北麓之間的新疆阿勒泰地區的考古發現無疑極具參考價值。這一地區是新疆最西北的地區，為現代中國、蒙古共和國、俄國、哈薩克斯坦於阿爾泰山的疆域交界處。遺址密集集中於阿爾泰山山區及其南麓，位置幾乎與巴澤雷克文化的阿克-阿拉哈（Ak-Alakha）遺址直接相接，也與波來爾遺址十分接近。（地圖）在哈巴河縣的早期鐵器時代東塔勒德墓地，碳十四定為西元年九世紀末至七世紀中，已發掘六十一座墓葬。⁷⁵ I 區 M27 直徑十二公尺的大積石塚結構與北邊的巴澤雷克墓葬相近，石堆下豎穴的南側以木板築槲室，北側殉馬兩匹。可惜被盜嚴重，發掘時除馬匹口中的馬銜，已無法得知隨葬品的情況。所幸其他倖存的墓葬中，仍可一窺隨葬品的狀況。其中最突出的阿爾泰特徵器物除前述馬銜外，還有 II 區 M6 出土的兩

73 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槲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 1 期，頁 18-22；王炳華，〈西漢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區歷史關係考察〉，《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頁 126。

74 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鈞沈〉，頁 154-166。

7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縣東塔勒德墓地考古發掘簡報〉，《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 126-137。

件金動物飾片，據報告所稱，一件為回首鹿形、一件為狼形。(圖 18-a、b) 這兩件金片動物均以剪影的形式表現，眼睛或其他身體特徵，以菱形及近似頓號的鏤空表現。在造形上，與早於巴澤雷克文化時期、西元前七世紀阿爾泰地區西元前八到七世紀斯基泰文化早期的奇列克塔 (Chilikta) 遺址所見金片動物相近。⁷⁶ (圖 19) M3 及 M32 出土的金花及 S 形金飾片，更與巴澤雷克墓葬所見皮花片飾 (如公雞片飾) 上的元素相近。(圖 18-c) 此外，II 區 M32 發現一件鍍金鐵泡，則是與時代相當的阿爾贊 2 號塚出土的鍍金銀箭鏃作法相近。(圖 18-d) 于建華及馬健通過對東塔勒德墓地遺存的分析，認為這一墓地在薩彥—阿爾泰地區與中國北方地區間的文化交往上，「可能不但充當了橋樑的作用，並且也是影響力的策源地之一」。⁷⁷

阿勒泰布爾津山口電站墓地 M2 及 M23 出土的動物形金片，正好顯示了波來爾與馬家塬馬車動物飾片的中間類型。⁷⁸ M2 的帶翼動物形金片雖已殘缺不全，但翅膀由動物的肩部向上延伸出捲曲的線條，翅膀內以槌打而成的平行谷折線表現紋理。(圖 18-e) 這件動物形金片表現了波來爾馬鞍上帶翼長角羊皮剪影與馬家塬馬車上谷折紋動物的中間類型，可能是馬家塬肩部突出的長角野山羊銀箔飾的模仿對象。(圖 2-b) 同一墓地 M23 出土的馬形金飾件稚樸的表現方式有別於斯基泰、塞種等文化的華麗細緻，反而更接近馬家塬 M5 銀大角鹿的面部。(圖 2-g、16-f) 阿勒泰地區這些介於巴澤雷克文化與馬家塬之間的特徵在歐亞草原東部地帶相當獨特，也少見鄰近地區模仿，因此暗示了巴澤雷克文化特徵向馬家塬傳遞時，先向南經過阿勒泰地區。

阿勒泰地區與巴澤雷克遺址在鹿角表現形式上的差異，也為傳遞路線提供線索。巴澤雷克遺址以肥厚多岔鹿角為所崇拜動物的象徵，除前文所述將馬匹裝飾成鹿之外，在 5 號塚出土的壁掛毯上，巫師頂著同類的鹿角，化身獅爪鹿格理芬。(圖 14-b) 在掛毯主畫面的分隔裝飾帶中，除花卉圖案，更有抽象化的變形鹿角。(圖 14-c) 類似的變形鹿角圖案應用相當廣泛，在木馬鞍上也可見到。最為圖案化的表現是 5 號塚的一件織品，其上主要紋飾是由連續的鹿角造形環繞著一個中心，以重複的形式布滿織品的主要位置。(圖 14-e) 其外為一周藍色鑲邊，內填帶有鹿

76 Joan Aruz et al. eds.,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sr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172-173.

77 于建華、馬健，〈公元前 8 世紀前後阿勒泰與週鄰地區考古學文化之考察——以東塔勒德墓地為例〉，《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頁 379。

7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布爾津山口電站墓地考古發掘簡報〉，《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頁 138-151。

角的波曲紋。下擺為連續的矩尺形，其間也填以抽象化的鹿角。(圖 14-d)⁷⁹ 阿勒泰地區的鹿角形象則與巴澤雷克不同，主要表現在數量眾多的岩畫及鹿石上。據潘玲的研究，相對於薩彥—阿爾泰地區以寫實動物為主的鹿石，阿勒泰地區的鹿石多為風格化的鹿形，為典型蒙古—外貝加爾鹿石。⁸⁰ 由地理分佈位置看，阿勒泰地區的鹿石分佈沿著阿爾泰山南麓的西北—東南走勢進入蒙古高原，為典型蒙古—外貝加爾鹿石分佈的最西段。⁸¹ 潘玲定為西周晚期至戰國時期的鹿石雖在細節上有時代差異，但風格化鹿紋的表現方式相對固定，鹿角均以連續的 C 形鉤角表現。(圖 20)

馬家塬遺址雖少見鹿的形象，但如羅森已指出的，M16 鍍金銀鐵矛上的紋飾與阿爾贊的鹿角形象及米努辛斯克地區出土劍套上的抽象化鹿角紋飾構圖基本一致。⁸² (圖 20-e) 但更加強烈的表現是如 M16 二號車車輪裝飾，外圈上的單一飾片如蒙古—外貝加爾鹿石風格化鹿角的單一 C 形鉤角，在車輪上連續起來形成如鹿石所見鹿角的連續 C 形曲線。(圖 20-a~d)⁸³ 若這樣的對應關係成立，則馬家塬所接受的阿爾泰文化因素應是經過阿勒泰地區的轉化，再順著阿爾泰山東南麓，進入蒙古西部及中部，直向黃河河套地區。(地圖)

在鄂爾多斯、長城沿線及北方地帶，內蒙古准格爾旗西溝畔、陝西神木納林高兔的發現似是少數與馬家塬有關的連結。其中最顯著的阿爾泰特徵是如巴澤雷克 2 號塚墓主人身上刺青的鳥鹿複合造形的出現。西溝畔的例子是以黃金打制而成，並以淺浮雕線條表現細節，納林高兔的金圓雕則是這種造形的立體形象。⁸⁴ (圖 21) 此外，納林高兔還出土了與馬家塬銀帶環、鏤空飾片及渦紋飾件類似的器物。⁸⁵ 飾

79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pls. 121, 137, 154, 173; Л. Л. Баркова, *Красота, сотканная из тай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в мире ков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2012), 34-46.

80 潘玲，〈論鹿石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2008 年 3 期，頁 319-330。

81 Esther Jacobson-Tepfer, James E. Meacham, *Archaeology and Landscape in the Mongolian Altai: an Atlas*; 王博，〈新疆鹿石綜述〉，《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頁 423-444。

82 Jessica Rawson,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8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27。

84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111; 戴應新、孫嘉祥，〈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 年 12 期，頁 25; 伊克昭盟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 年 7 期，頁 1-10。納林高兔金圓雕的相關討論見 Emma C. Bunker, "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 *Artibus Asiae* 53. 1/29 (1993): 36, 45; 張文玲，〈秦文化的草原色彩——以戰國晚期金怪獸為例〉，《故宮文物月刊》，399 期，2016 年 6 月，頁 66-73。

85 馬家塬的同類器物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頁 64、66、92、108。

片主要圖形上布滿小凸點的作法，不見於阿爾泰地區，卻是馬家塬金銀飾片上的主要特徵之一。(圖 22-b) 地理位置上更接近馬家塬的寧夏西吉縣新營鄉陳陽川村，也有一些過渡風格的表現。除 S 形馬鏢、對稱鳥首的花朵形牌飾，鬃毛及尾巴末端帶有鳥首的老虎牌飾與馬家塬所見相近，是由西溝畔所見鬃毛末端帶有鳥首的鳥鹿複合造形而來。(圖 3-a、21-c、22-c)⁸⁶ 從內蒙古西溝畔、陝西神木納林高兔及寧夏西吉陳陽川村的發現，或許暗示了從阿爾泰山、蒙古鄂爾多斯再銜接到馬家塬地區的路線所在。

中原地區少見明顯的巴澤雷克本地文化因素，這表示巴澤雷克文化因素並未通過前述路線、半月形地帶或馬家塬進入中原地區，而是由鄂爾多斯往南，直接到了馬家塬。

六、結語：文化傳遞下的複式華麗

雄鹿、猛虎與野山羊是阿爾泰地區鐵器時代文化活力的來源，與當地的自然生態、人口生計及文化表現密切結合，至今依然未變。這三種主題在馬家塬遺址的出現，不僅是西戎與草原文化廣泛交流的結果，且應有更加深刻的背景。在華夏與草原文化交會地帶，或童恩正及羅森所強調的半月形地帶中，馬家塬遺址以其與巴澤雷克文化的顯著相似，而有別於其他遺址。而馬家塬馬車所展現的外來華夏與外來草原文化在本地的結合方式，無疑是其中最顯著的例證。本文已試圖辨析這些文化因素由何而來，又如何為馬家塬本地貴族所採用並重新詮釋，最終成為本地所獨有的文化特徵。

相對於阿爾泰巴澤雷克文化對馬家塬的影響，巴澤雷克遺址所見的中原文物，特別是 5 號塚的刺繡織品、6 號塚的銅鏡、漆器，自墓地發掘之初，便備受重視，作為阿爾泰與中原地區交往強有力的證據。5 號塚出土的一輛拆解四輪車，也被視為重要例證。(圖 23-a) 因為歐亞草原鐵器時代墓葬幾乎未見葬車，在缺乏對比的情況下，所有的學者都認為巴澤雷克的四輪馬車是中原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就著墓葬中的華夏物品，發掘者魯金柯認為 5 號塚的墓主是位遠嫁而來的華夏公主，這輛造形具有中原風格的車子是她的嫁妝。⁸⁷ 這種與中國馬車相類似的說法為許多學者

86 延世忠、李懷仁，〈寧夏西吉發現一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1992 年 6 期，頁 574，圖版 8。

87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190-191.

接受，耶特馬爾認為這是模仿中國馬車製作的明器，⁸⁸ 馬健則認為這輛車是由中原工匠所製造，可能是經由餽贈或貿易而來。⁸⁹ 與目前中原地區已發現的馬車對比，軛衡、多輻車輪、上層編織式的車輿欄雖有相近之處，但不論是四輪車的結構、高大棚頂以及車輿下欄的連珠柱欄，均未見於中原地區。因此，這一輛馬車不可能是由中原或鄰近地區製作後，再轉運至阿爾泰。但值得注意的是，車輿上層編織式車欄見於馬家塬，前低後高的形式與戰國晚期的秦國車輿相近。（圖 1-e、23-b）⁹⁰ 車輪輻條多達三十四根，入轂端扁平，逐漸向入輪牙端轉細圓，均符合中原馬車的特點。⁹¹（圖 23-a）巴澤雷克以側面立柱支撐棚頂的作法，不見於中原地區，卻與馬家塬 14 號墓 2 號車以側邊立柱方式支撐傘蓋的作法接近，兩者之間或許有關。⁹²（圖 23-c）Sören Stark 指出，因輪軸不能轉動，所以車子無法實際使用，這樣的車子是在儀式中使用，平常可以拆卸，以備游牧民族遷徙時攜帶。⁹³ 若然，與裝飾華麗的馬匹相對，阿爾泰的騎馬民族以其所認為的華夏風格，製作出巨型木車，呈現著草原騎馬民族對中原定居民族的想像。

雖然馬家塬貴族所承襲、轉譯的巴澤雷克文化因素並未進一步對中原地區產生影響，但通過本文所追索的路線，馬家塬遺址所見具有中原特徵的彩漆馬車，被添上了獨樹一幟的草原面貌；反之，帶小尖帽的翹鬍子中亞人物形像在馬家塬墓地的出現，⁹⁴ 或許表示了他們利用同一條通道，將織繡、銅鏡及造車知識輾轉帶到了阿爾泰，為當地貴族帶來別樣的生活風情。

88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116-117.

89 馬健，〈公元前 8-3 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頁 70。

90 輿欄形式近似戰國平涼廟莊 M1 出土的帶傘蓋馬車。見魏懷珩，〈甘肅平涼廟莊的兩座戰國墓〉，《考古與文物》，1982 年 5 期，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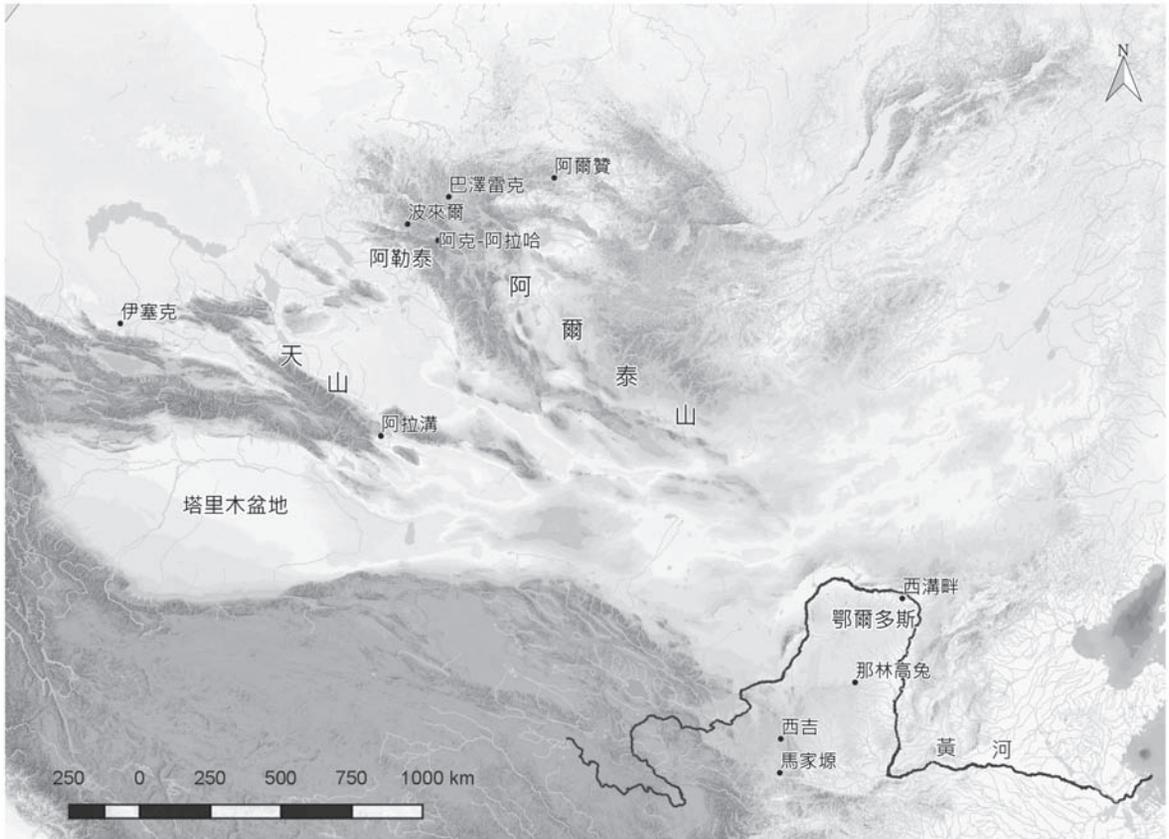
91 中原馬車輪輻具體特徵可參見淮安市博物館，〈淮安運河村戰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98。

92 馬家塬 14 號墓 2 號車復原，見趙吳成，〈戰國戎人造車〉，頁 41-42。

93 Sören Stark, "Nomads and networks: elites and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126, 138, n. 75.

94 馬家塬墓地出土了兩種帶小尖帽的翹鬍子人物像，其面部具有中亞特徵。這些人物像的族屬及文化來源等相關問題的討論，見王輝，〈甘肅發現的兩周時期的“胡人”形象〉，《考古與文物》，2013 年 6 期，頁 59-68。以小尖帽表現域外胡人的作法，經常出現在漢代藝術中，相關討論見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所見“胡人”外貌〉，《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97-314。巴澤雷克遺址人物形象中並未見到小尖帽，但人物有黑色翹鬍子的特徵。而波斯、斯基泰、塞種戴尖頂帽人物的下巴多留有大鬍子。

〔後記〕二〇一五年為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國銅鏡的源流」(NSC 102-2410-H-136 -001) 赴俄國莫斯科及聖彼得堡進行考察，得以目驗大量歐亞草原出土文物，促成本文概念的提出。在探索歐亞草原與中原地區交流互動的過程中，一直得到牛津大學 Jessica Rawson 教授的啟發與鼓勵。本文的完成受益於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資料蒐集、圖表及訂正，有賴於學友單月英、張菘、林農堯及葉乃婕的協助，在此併申謝忱。



地圖 相關遺址分佈圖 (林農堯製)

引用書目

一、中文文獻

- 于建華、馬健，〈公元前 8 世紀前後阿勒泰與週鄰地區考古學文化之考察——以東塔勒德墓地為例〉，《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 375-383。
- 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鈎沈〉，《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頁 154-166。
- 王炳華，〈西漢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區歷史關係考察〉，《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頁 122-134。
- 王博，〈新疆鹿石綜述〉，《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 423-444。
- 王輝，〈甘肅發現的兩周時期的“胡人”形象〉，《考古與文物》，2013 年 6 期，頁 59-68。
- 王輝，〈馬家塬戰國墓地綜述〉，《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0-31。
- 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文物》，2009 年 10 期，頁 70-77。
- 王輝，〈發現西戎——張家川馬家塬墓地〉，《中國文化遺產》，2006 年 7 期，頁 56-77。
- 代威威，〈隴東地區東周時期金銀器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秦安王洼戰國墓地 2009 年發掘簡報〉，《文物》，2012 年 8 期，頁 27-37。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 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 9 期，頁 4-28。
- 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 田廣金、郭素新，《北方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伊克昭盟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 年 7 期，頁 1-10。
- 吉謝列夫 (Kiselev, S. V.)，《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1、1985。
-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7 ~ 2008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10 期，頁 25-51。
-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 2008 ~ 2009

- 年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10期，頁4-26。
-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2010～2011年發掘簡報〉，《文物》，2012年8期，頁4-26。
- 米玉梅、趙吳成，〈從馬家塬戰國墓管窺上古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魯東大學學報》，第32卷第6期，2015，頁88-91。
- 艾瑪·邦克(Emma C. Bunker)，〈中國游牧民族的藝術——具有蠻夷風味的東周、秦及漢代藝術品〉，《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574-576。
- 余泰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李零，〈論中國的有翼神獸〉，《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87-135。
-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2分，1993，頁231-408。
-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所見“胡人”外貌〉，《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97-314。
- 延世忠、李懷仁，〈寧夏西吉發現一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1992年6期，頁573-575。
- 林沄，〈絲路開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線〉，《草原文物》，2011年1期，頁55-64。
- 林沄，〈歐亞草原有角神獸牌飾研究〉，《西域研究》，2009年3期，頁34-44。
-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先秦兩漢考古學歸屬問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80-192。
- 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匈奴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馬健，〈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歐亞學刊》，第八輯，2006，頁38-84。
- 馬健，〈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3期，頁50-64。
- 國家文物局編，〈北趙晉侯墓地一號車馬坑〉，《2006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66-67。
- 張文玲，〈秦文化的草原色彩——以戰國晚期金怪獸為例〉，《故宮文物月刊》，399期，2016年6月，頁66-73。
- 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淮安市博物館，《淮安運河村戰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郭物，〈歐亞草原東部的考古發現與斯基泰的早期歷史文化〉，《考古》，2012年4期，頁56-69。
-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1期，頁71-116。
- 鄂爾多斯博物館，《鄂爾多斯青銅器》，北京：文出版社，2006。
- 黃維、陳建立、王輝、吳小紅，《馬家塬墓地金屬製品技術研究：兼論戰國時期西北地區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布爾津山口電站墓地考古發掘簡報〉，《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138-151。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縣東塔勒德墓地考古發掘簡報〉，《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126-137。
- 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頁18-22。
- 楊建華，〈張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尋蹤——天山通道的開啟〉，《北方先秦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215-222。
- 楊建華，《北方先秦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 楊建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楊建華、包曙光，〈俄羅斯圖瓦和阿爾泰地區的早期游牧文化〉，《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384-402。
- 趙化成，〈甘肅東部與羌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145-176。
- 趙吳成，〈甘肅馬家原戰國墓馬車的復原（續一）〉，《文物》，2010年11期，頁84-96。
- 趙吳成，〈甘肅馬家原戰國墓馬車的復原——兼談族屬問題〉，《文物》，2010年6期，頁75-83。
- 趙吳成，〈戰國戎人造車〉，《故宮文物月刊》，398期，2016年5月，頁38-50。
- 潘玲，〈論鹿石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2008年3期，頁311-335。
- 魯金科(Sergei I. Rudenko)，〈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年2期，頁37-48、108-111。
- 戴應新、孫嘉祥，〈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2期，頁23-30。
-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隊，《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魏懷珩，〈甘肅平涼廟莊的兩座戰國墓〉，《考古與文物》，1982年5期，頁21-33。
- 羅豐，〈中原製造——關於北方動物文金屬牌飾〉，《文物》，2009年10期，頁56-63，96。

羅豐，〈以隴東為中心甘寧地區春秋戰國時期北方青銅文化的發展與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合刊），頁29-49。

二、日本文獻

梅原未治，《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名古屋：星野書店，1938。

高濱秀，《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國北方の青銅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97。

三、西文文獻

Akischev, K. A.. *Issyk Mound: The Art of Saka in Kazakhstan*. Moscow: Iskusstov Publishers, 1978.

Aruz, Joan. et al. eds..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Azarpay, Guitt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 *Artibus Asiae* 22.4 (1959) : 313-339.

Barnard, Noel. *The Chu Silk Manuscrip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tudies on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Part 2* (Monograph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5).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3.

Bunker, Emma C.. "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 *Artibus Asiae* 53.1/2 (1993) : 27-50.

Bunker, Emma C. et al..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Inc., 1970.

Chang, Claudia and Katharine S. Guroff. *Of Gold and Grass: Nomads of Kazakhstan*. Maryland: FIAE/Mosaic, 2006.

Cugunov, K., H. Parzinger, A. Nagler. "Der skythische Fürstengrabhügel von Arzan 2 in Tuva. Vorbericht der russisch-deutschen Ausgrabungen 2000-2002," *Eurasia Antiqua* 9 (2003): 113-162.

Cugunov, K., H. Parzinger, A. Nagler. *Der Goldschatz von Arzan. Ein Fürstengrab der Skythenzeit in der südsibirischen Steppe*. Munich: Schirmer/Mosel, 2006.

Gorbunov, A., Z. Samashev, and E. Severskii. *The Treasures of Frozen Burial Mounds of the Kazakh Altai: Materials of the Berel Burial Site*. Alma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 Kh. Margul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05.

Grjaznov, M.. *Der Materialien Arz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aterialien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23, Munich: C. H. Beck, 1984.

Hajdas, I., G. Bonani, I. Slusarenko, and M. Seifert, "Chronology of Pazyryk 2 and Ulandryk 4 kurgans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radiocarbon dating and dendrochronology—A step towards more precise dating of Scythian burials," in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Migration*

- in Eurasia*,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2004, 107-116.
- Hančar, Franz. "The Eurasian animal style and the Altai complex," *Artibus Asiae* 15. 1/2 (1952) : 171-194.
- Haskins, John H.. "China and Alta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2 (1988) : 1-9.
- Jacobson-Tepfer, Esther and James E. Meacham. *Archaeology and Landscape in the Mongolian Altai: an Atlas*, Redlands, California: Esri Press, 2010.
- Jettmar, Karl.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23 (1951) : 135-223.
- Jettmar, Karl. *Art of the Steppes*, New York: Greystone, 1967.
- Jettmar, Karl. "Body-painting and the roots of the Scytho-Siberian animal styl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Napoli: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 Karlgren, Bernhard.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7 (1945) : 101-144.
- Kato, Kyuzo. "Cultural exchange on the ancient steppe route: some observations on Pazyryk heritage,"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32 (1992) : 5-20.
- Lerner, Judith. "Some so-called Achaemenid objects from Pazyryk," *Source, Not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10.4 (1991) : 8-15.
- Mallory, J. P.. "The date of Pazyryk," in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199-211.
- Pan, 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North China and the Eurasian Steppe from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middle Western Han," *Asian Archaeology* 3 (2015) : 95-106.
- Patch, Diana. *Dawn of Egyptian Ar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2.
- Prusek, Jaroslav. *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B.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 Rawson, Jessica.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 1000-650 BC," *Archäologie in China* 1 (2010) : 1-41.
- Rawson, Jessica. "Steppe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le of hand-to-hand comb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33.1 (2015) : 37-95.
- Rawson, Jessica. "Gold, an exotic material in early China," in *Stories that Interconnect the Past: Notes from across Ancient Asia*, edited by Kathryn Linduff and Karen Rub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2018 (forthcoming).
- Rawson, Jessica and Emma Bunker.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Hong Kong: The Oriental

-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0.
- Roes, Anne. "Achaemenid influence upon Egyptian and nomad art," *Artibus Asiae* 15.1/2 (1952) : 17-30.
- Rostovtzeff, M. I.. *Le Centre de L'asie, La Russie, La Chine et Le Style Animal*.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29.
- Rudenko, Sergei 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70.
- Samashev, Zainolla S.. "The Berel kurgans: som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in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edited by 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1-49.
- So, Jenny F. and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London: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Stark, Sören "Nomads and networks: elites and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edited by Sören Stark and Karen S. Rubins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7-138.
- Stark, Sören and Karen S. 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Yablonsky, Leonid T.. "Written source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the Sakai n Central Asia," i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ry: Zinat Press, 1995, 190-199.
- Yablonsky, Leonid T..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i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ry: Zinat Press, 1995, 200-249.
- Wu, Xin. "Persian and central Asian elements in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the early nomads at Pazyryk, Southern Siberia," in *Social Orders and Social Landscapes*, edited by Laura M. Popova et al., New 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379-392.
- Баркова, Л. Л. *Красота, сотканная из тай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в мире ков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2012, 34-46.
- Горбунов, А. П., З. С. Самашев, Э. В. Северский. *Сокровища мерзлых курган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ТОО Иль-Тех-Кітап, 2005.
- Королькова, Е. Ф.. *Властители Стен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2006.
- Самашев, З. С..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аймас», 2011.
- Самашев, З. С., Г. Базарбаева, Г. Джумабекова, С. Сунгатай. *Берел-Berel*. Алматы, 2000.
- Самашев, З. С., К. Ш. Фаизов, Г. А. Базарбаев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и полевочвы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Алматы: ОФ «Берел», 2001.

Самашев, З. С., В. П. Мыльников. *Деревообработка у древних скотовод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деревян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 из кургана II могильника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ОФ «Берел», 2004.

Stags, Tigers and Ibexes in the Mountains: The Origins and Transmission of Steppe Patterns Seen on Chariots Found at Majiayuan in Zhangjiachuan, Gansu

Wu, Hsiao-yu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Stags, tigers, and ibexes are lively motifs in crafts that trace their origins back to the Iron Age in the Altaic region of Central Asia. They exhibit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ir means of existence, and as a for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representing facets of life that continue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These three motifs also were an important form of animal decoration on the chariots excavated from Majiayuan in Zhangjiachuan at Tianshui, Gansu, which date to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y point to the interaction of Xirong and steppe cultures, the background for which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builds on research done previously to explore and reexamine in detail the various theories about steppe elements found in remains from the Majiayuan site. Not only does the study confirm that Majiayuan inherited from the Pazyryk Culture in the Altaic region, it also makes a detailed comparison with “stag stone” monuments in Mongolia and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Ordos region. It is proposed that elements of Pazyryk culture came south to Majiayuan from the southern Altaic Mountains via Mongolia and Ordos. With a general comparison of the objects recovered from these reg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changes and stag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lements from Pazyryk culture and how these features were used and reinterpreted by the nobility at Majiayuan.

Keywords: Steppe animal pattern, Majiayuan, Altai, East Eur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Iron 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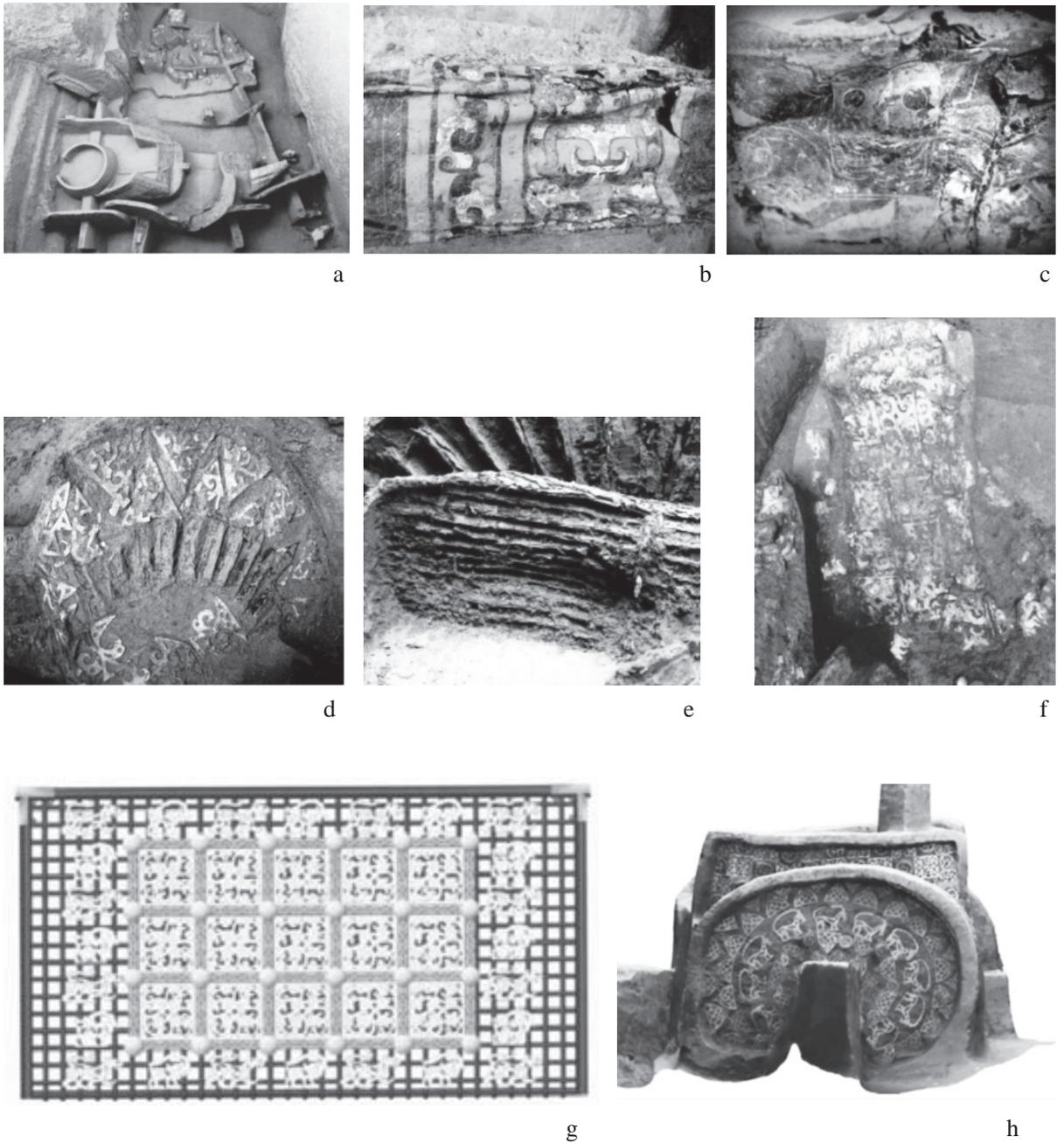


圖 1 馬家塬遺址出土馬車 a. M3 馬車出土全景 b. 1 號墓 3 號車車軸局部 c. 1 號墓 3 號車車廂板局部 d. 1 號墓 1 號車車輪局部 e. 1 號墓 2 號車車廂內側 f. 3 號墓車廂板 g. 16 號墓 1 號車側廂板復原 h. M21 車廂及車輪 (a、f. 引自《文物》2008 年 9 期，圖 7、17；b-e. 引自《中國文化遺產》2007 年 6 期，頁 69、70；g. 引自《文物》2010 年 11 期，圖 2；h. 引自《文物》2012 年 8 期，圖 44)



a



b



c



d



e



f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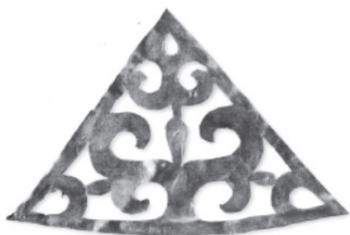
h



i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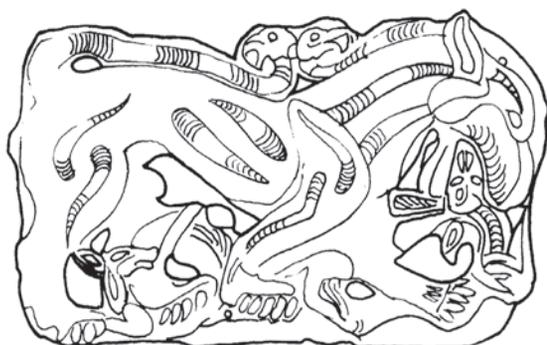


k



l

圖2 馬家塬馬車上草原風格飾片(j引自《文物》2008年9期,圖37,其他引自《西戎遺珍》,頁72、74、77、79、81、83、84、92、101、104)



a



b



c

圖3 馬家塬遺址出土金飾 a. M14 腰帶牌飾 b. M15 腰帶牌飾 c. M15 盤羊腰帶飾 (引自《文物》2009年10期, 圖37、5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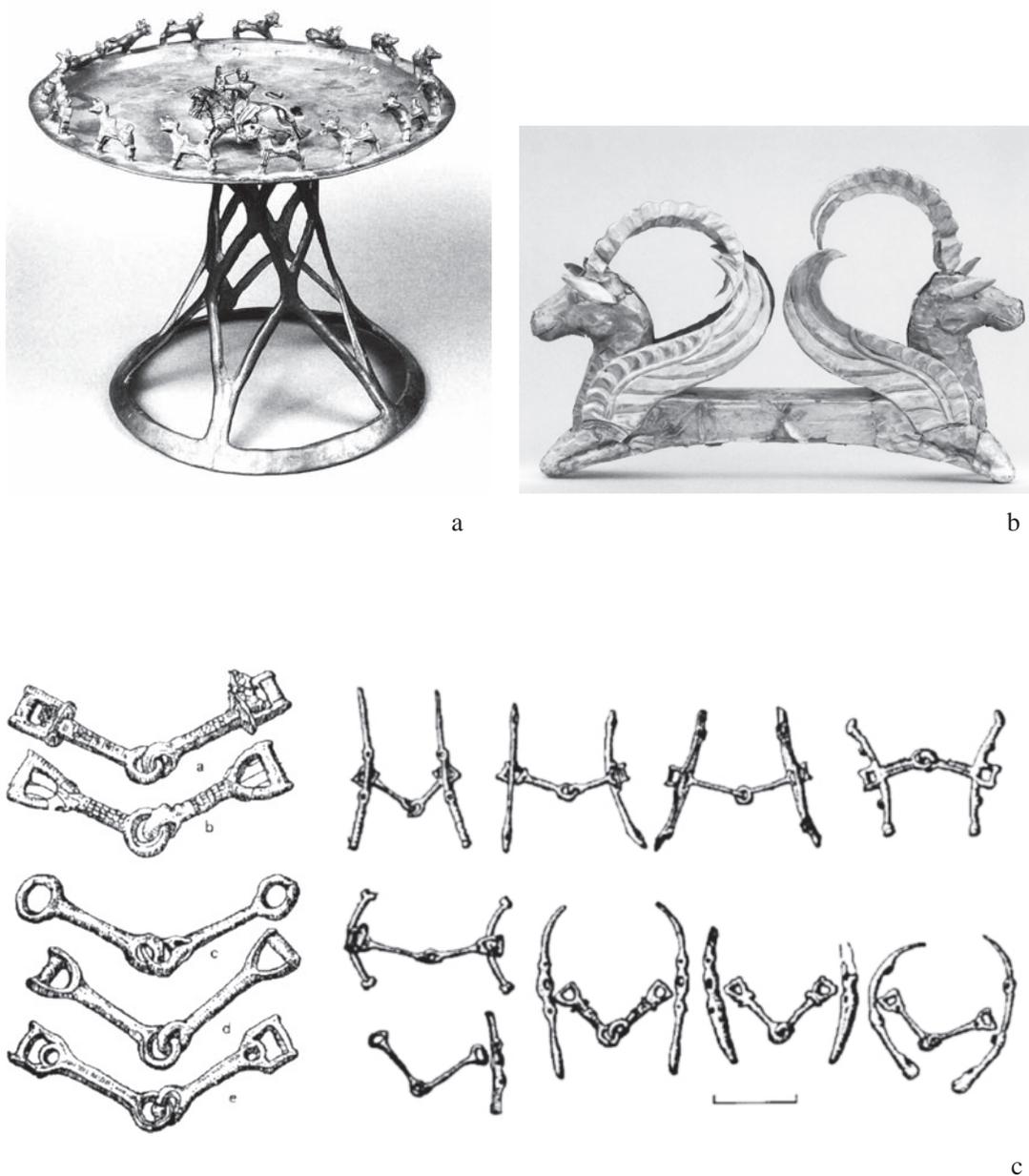


圖 4 塞種文化文物 a. 高足盤 b. 依塞克塚帽飾 c. 馬銜與馬鑣 a、b. 引自 *Of Gold and Gress*, fig. 67 ; c. 引自 *Nomads or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figs. 43,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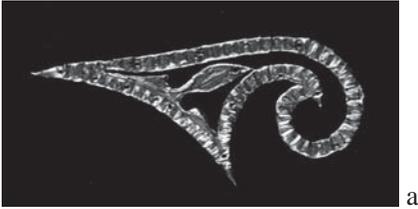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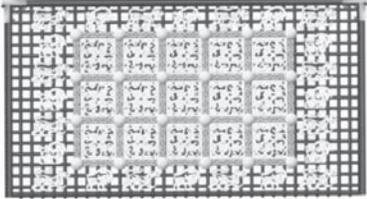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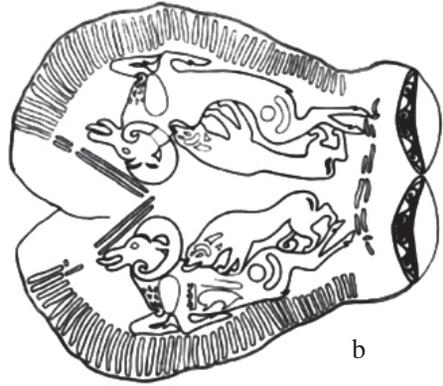
| | 依塞克塚金飾 | 馬家壩金銀飾 |
|--------|---|--|
| 鏤空飾片 |  a |  g |
| 飾片裝飾工藝 |  b |  h |
| 虎 |  c |  i |
| 羊 |  d |  j |
| 虎羊排列 |  e |  k |
| 後肢翻轉 |  f |  l |

圖 5 依塞克塚出土金飾與馬家壩金銀飾比較 a-f. 引自 *Issyk Mound*, 47, 86, 88, 92, 106; g、k. 引自《文物》2010 年 11 期，圖 2；h-j、l. 引自《西戎遺珍》，頁 60、72、79、92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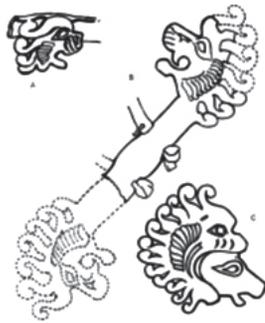
b



c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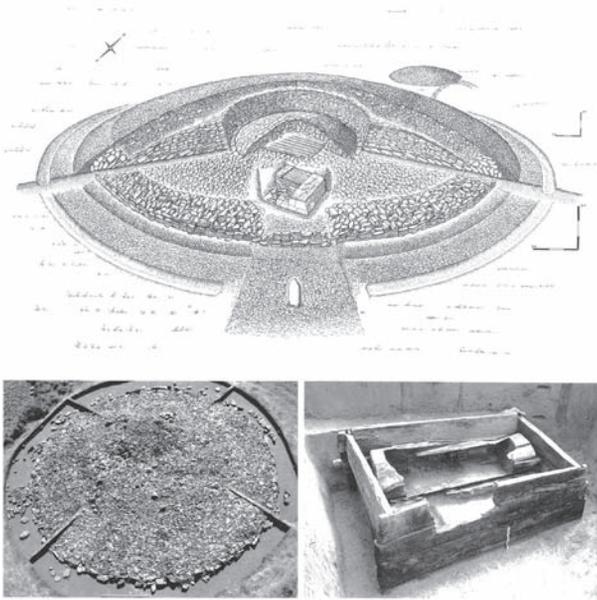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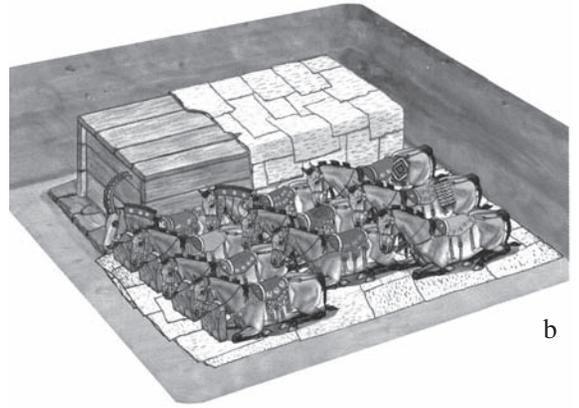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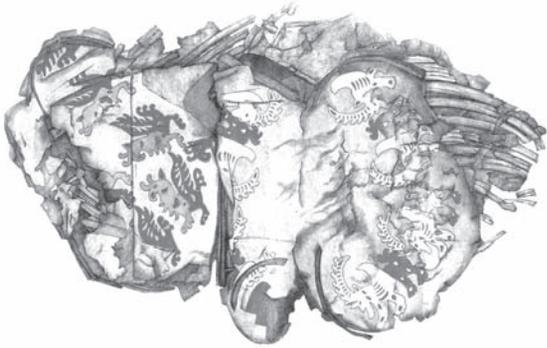
圖6 巴澤雷克遺址馬具 a. 1號塚出土鹿形馬飾 b. 2號塚馬鞍 c、d. 貼金木馬具 e. 木馬鑣 f. 角鑣 (a. 攝於冬宮博物館；b-f. 引自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figs. 67, 75, 88, pls. 77, 87, 94, 95,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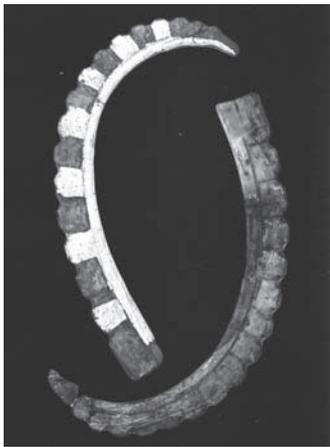
a



b



c



d



e

圖 7 波來爾遺址墓葬及木馬飾 a. 11 號塚 b. 10 號塚復原圖 c. 10 號塚馬鞍 d. 11 號塚羊角形木馬飾 e. 11 號塚木馬飾 (引自 *Nomads and Networks*, 34-35, 42, 46, 76)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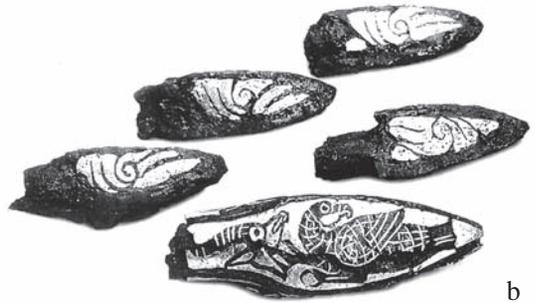


b

圖 8 馬家塬與波來爾馬具比較 a. 馬家塬 M1 出土銜鑣 (引自《西戎遺珍》，頁 208-209) b. 波來爾 36 號塚出土銜鑣 (引自 *Nomads and Networks*, 102)



a



b

圖 9 阿爾贊 2 號塚出土鍍金銀鐵兵器 a. 鐵斧 (引自 *Nomads and Networks*, 26) b. 鐵鏃 (引自 *Властители Сменеү*, 17)



a



b

圖 10 馬家塬出土鍍金銀鐵車器 a. 14 號墓 1 號車鍍金銀鐵車器出土情況 b. 鍍金銀鐵車車 (引自《西戎遺珍》，頁 172、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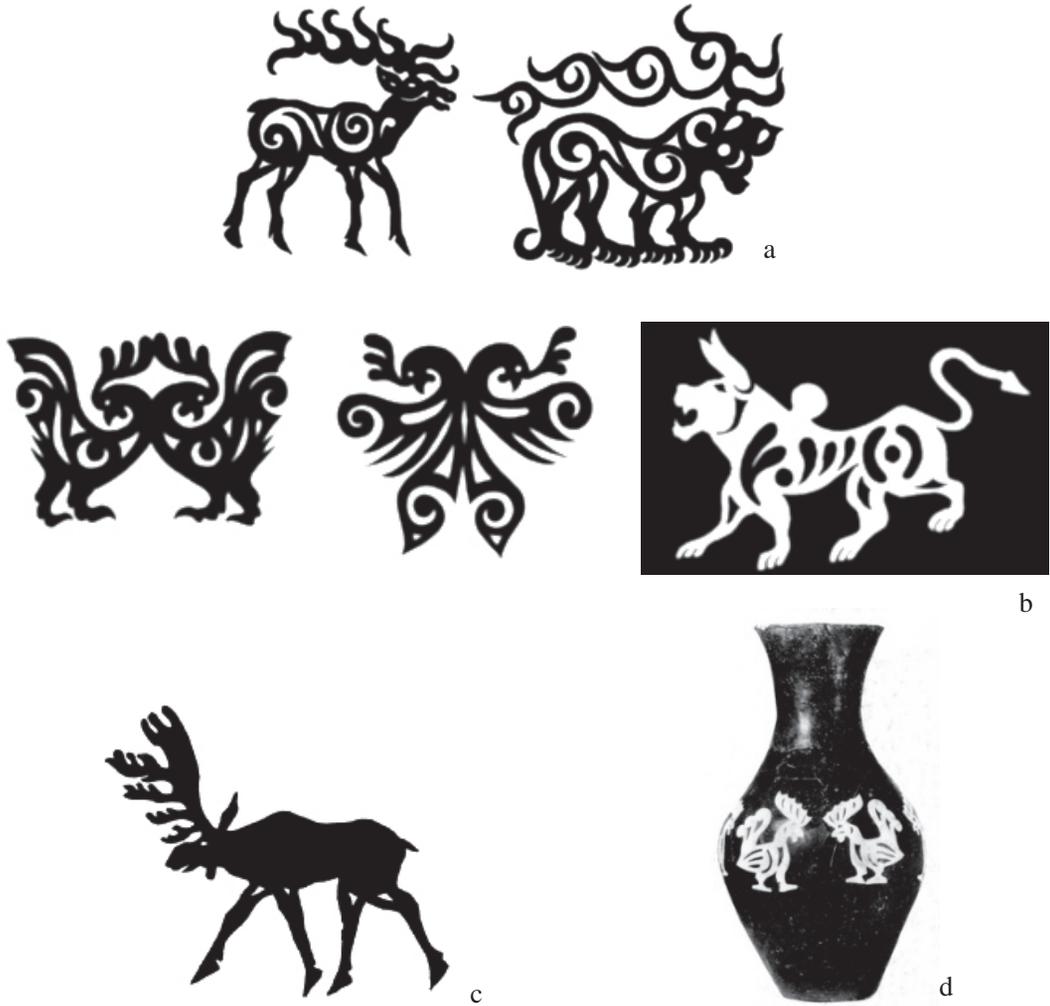


圖 11 巴澤雷克文化剪影式動物圖像 a. 圖克塔遺址 b. 巴澤雷克1號塚 c、d. 巴澤雷克2號塚 (引自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figs.10, 11, 22, 114, 137, pl.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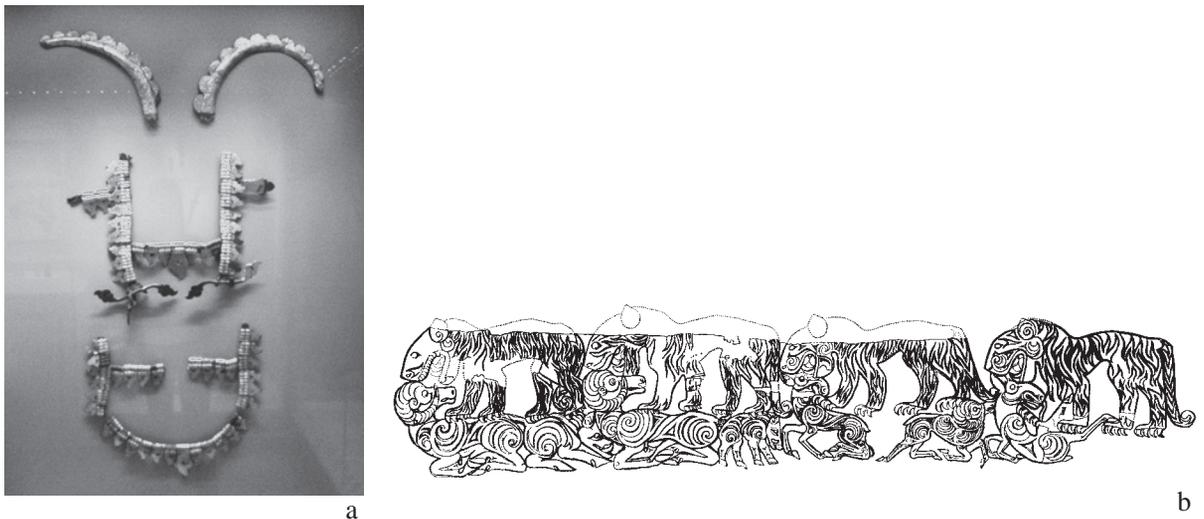


圖 12 巴沙阿德遺址出土文物 a. 馬絡飾 (攝於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b. 虎與多種動物搏鬥的雕刻 (引自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269)



a



c



b



d

圖 13 草原地區所見長角野山羊形象 a. 卡拉套遺址岩畫 (引自 *Nomads and networks*, 70) b. 西伯利亞 (引自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l. 210) c. 鄂爾多斯 (引自《鄂爾多斯青銅器》, 頁 208) d. 現代西伯利亞長角野山羊 (Siberian ibex) (引自 <http://www.zoochat.com/1844/siberian-ibex-300131/>)



a



b



c



e



d

圖 14 巴澤雷克遺址出土毛織品 a-c. 巴澤雷克 4 號塚掛毯 (全幅與局部) (引自 *Красота, сотканная из тай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в мире ковры*, 34, 42, 45) d-e. 巴澤雷克 5 號塚馬鞍飾 (全幅與局部) (攝於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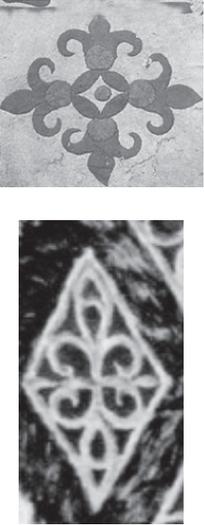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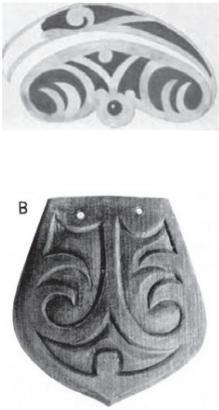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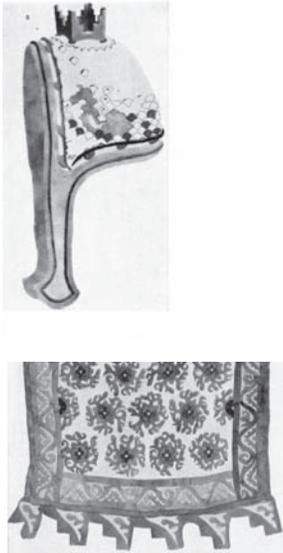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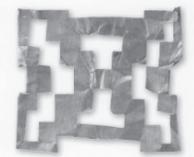
| | 花卉 | 捲草葉 | 矩形 | 心形 |
|------|---|--|---|--|
| 巴澤雷克 |  |  |  |  |
| 馬家塬 |  <p>M14:65</p> |  <p>M14</p>  <p>M14:67</p> |  <p>M14:55-2</p>  <p>M16:87</p> |  <p>M1:73</p>  <p>M3:29-1、2</p> |

圖 15 巴澤雷克與馬家塬紋飾比較

巴澤雷克紋飾引自 *Красота, сотканная из тай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в мире ковры*, 34, 42;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pls. 105, 150, 155, 160, 164

馬家塬紋飾引自《西戎遺珍》，頁 100、101、104、173、174；《文物》2008 年 9 期，圖 3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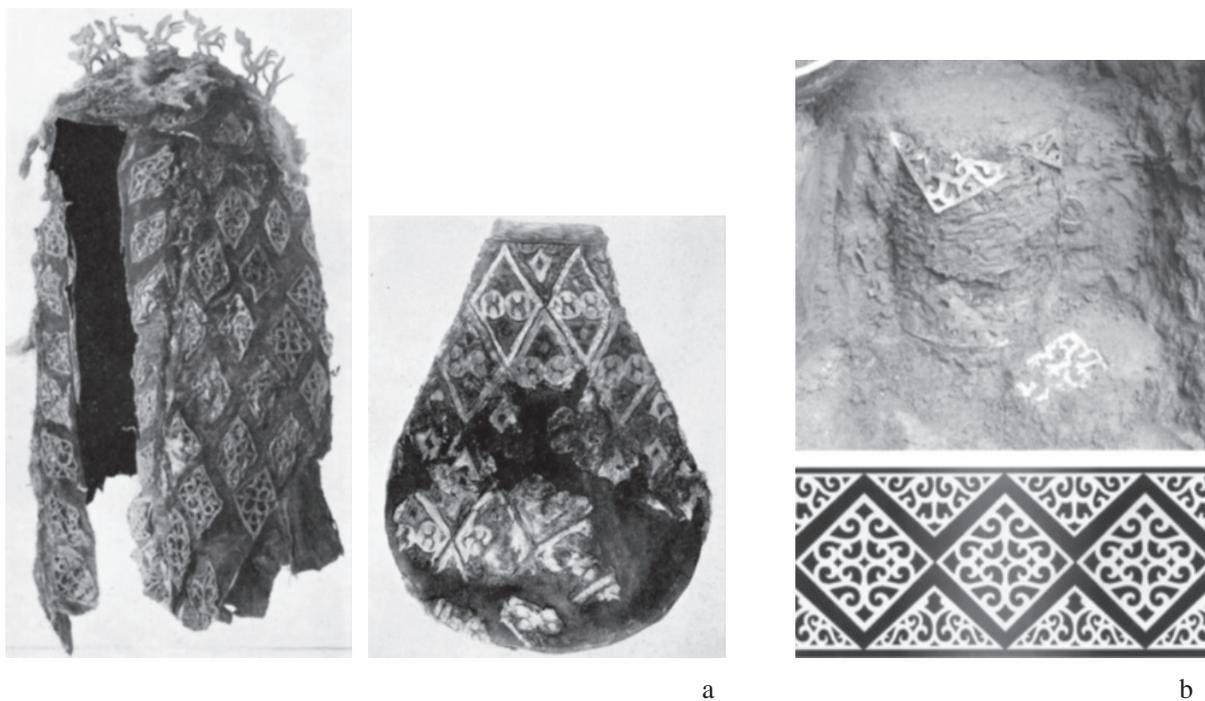


圖 16 巴澤雷克遺址與馬家塬遺址所見菱格圖形

a. 巴澤雷克遺址出土帶有拼接裝飾的毛、皮製品（引自 *Frozen Tombs of Siberian*, pls. 13, 65） b. 馬家塬 M16 出土木杯（引自《文物》2010 年 10 期，頁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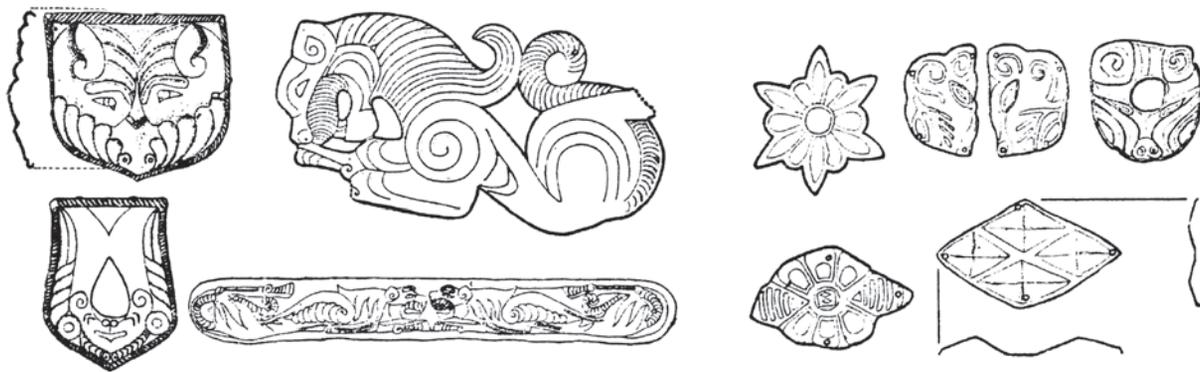


圖 17 新疆阿拉溝遺址出土金飾 引自《文物》1981 年 1 期，頁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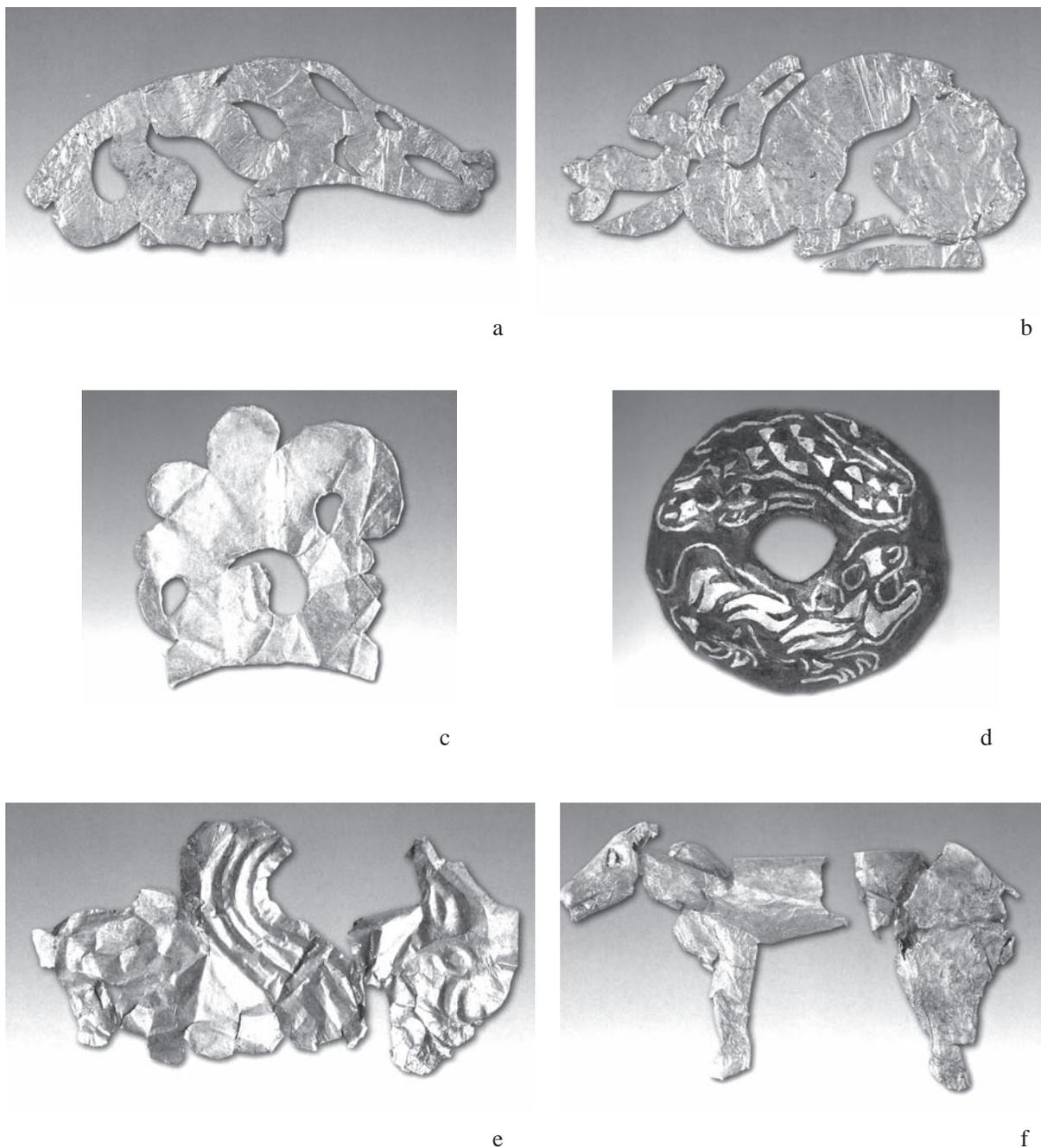


圖 18 新疆阿勒泰地區出土金飾及鍍金鐵器
a~d. 東塔勒德墓地出土 e~f. 布爾津山口電站墓地出土
引自《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圖版 31、32、37、45、5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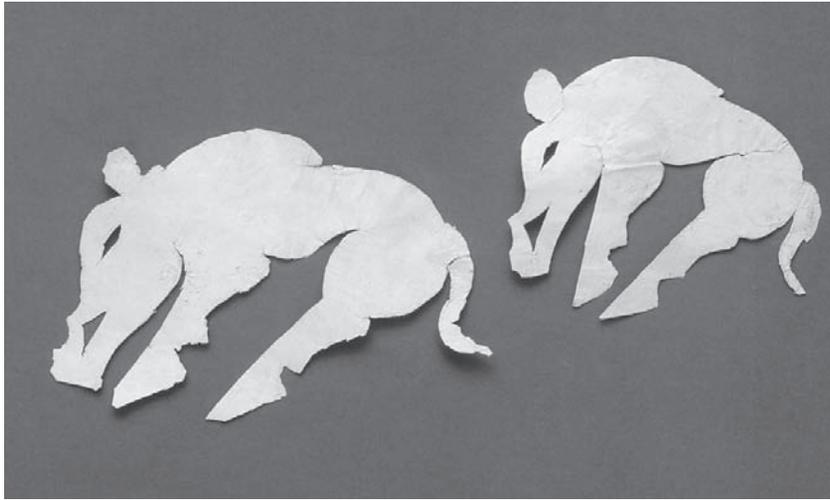


圖 19 阿爾泰 Chilikta 遺址出土金飾 引自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l. 171



a



b



c



d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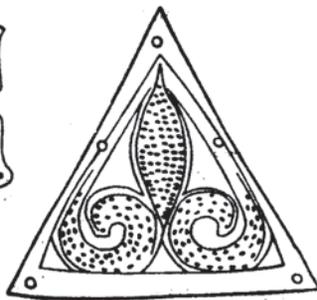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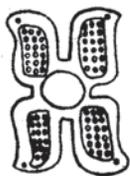
圖 20 蒙古鹿石上的鹿角與馬家塢馬車外圈圖像比較 a、b. 蒙古西部阿爾泰山東南麓岩畫（引自 *Archaeology and Landscape in the Mongolian Altai: an Atlas*, 16, 199） c. 蒙古中部後杭愛省鹿石（引自《考古學報》2008 年 3 期，頁 326） d. 馬家塢 M16 二號車車輪裝飾復原 e. 馬家塢 M16 出土貼金銀鐵矛（4、5. 引自《西戎遺珍》，頁 27、211）



圖 21 鳥鹿複合造形 a. 巴澤雷克 2 號塚墓主刺青 (引自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figs. 130-131) b、c. 內蒙古西溝畔遺址出土 (引自《文物》，1980 年 7 期，頁 2) d. 陝西神木納林高兔出土 (引自《文物》，1983 年 12 期，頁 67)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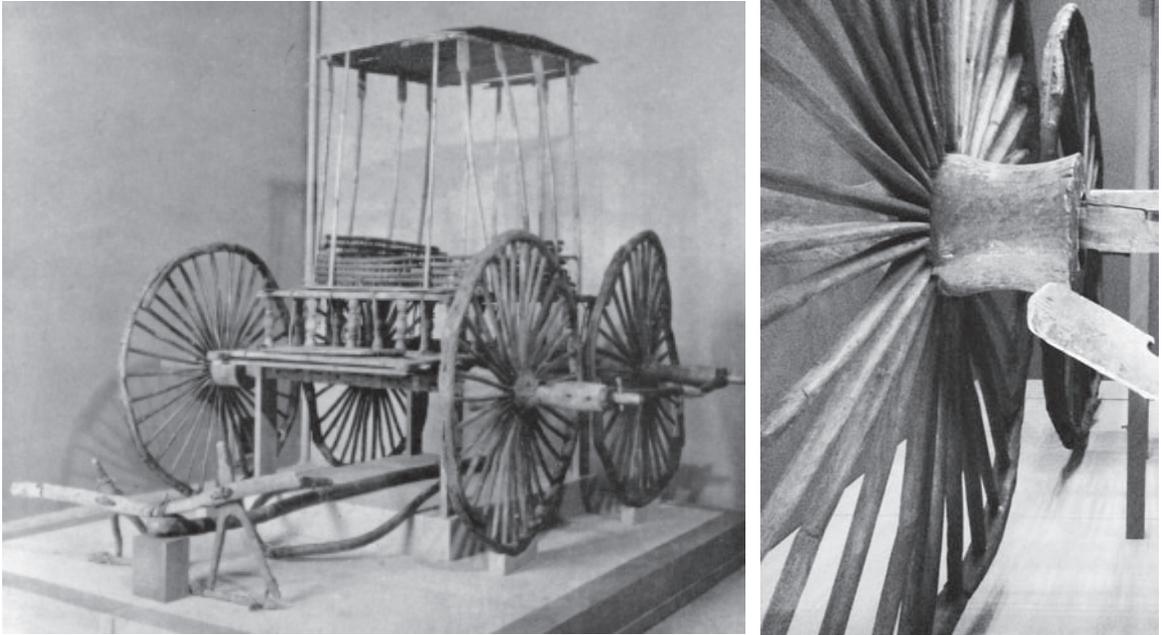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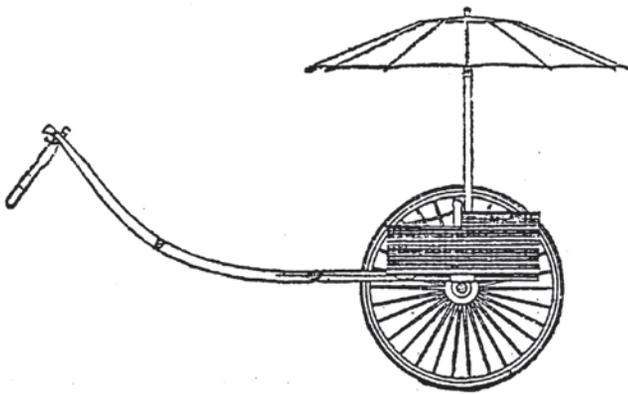


c

圖 22 河套地區出土相關文物 a. 馬家塬出土銀帶環（引自《西戎遺珍》，頁 65） b. 陝西神木納林高兔出土相關文物（引自《文物》1983 年 12 期，頁 25） c. 寧夏西吉陳陽川村出土相關文物（引自《考古》1992 年 6 期，頁 574）



a



b



c

圖 23 巴澤雷克四輪車與秦車、馬家塬馬車比較 a. 巴澤雷克四輪車（引自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pl. 131；車輪局部攝於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b. 甘肅平涼廟莊 M1 馬車（引自《考古與文物》1982 年 5 期，圖 4） c. 馬家塬 14 號墓 2 號車（引自《故宮文物月刊》2016 年 5 月，圖 7）

